



OPPOSITION PARTY

策劃：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開篇 Prologue	01	目錄 Preface
02	03	
在野黨簡介 Contents	05	
思想火種 The seed of ideas		人物專訪 Voices of Change
05-07		民主火種 The Spark of Democracy
08-11	12	
真相中國 Truth China		中共罪行 The CCP's Crimes
12-16		時事評論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17-22		社會評論 Social Commentary
23-36	37	
民運之路 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		民運之聲 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37-44		民運行動 Democratic action
45-48		民運風采 Portrai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49		民運同道 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
50-51	52	
連載 Serial		作品連載 Serialized Works
52-55	56	
檔案館 Archives		迫害實錄 Persecution Records
56-57		民主黨史 Democratic Party History
58		中國記憶 Chinese Memory
59-60	61	
雜誌社介紹 About the Magazine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 1998 年 9 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 9 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 11 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 27 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 25 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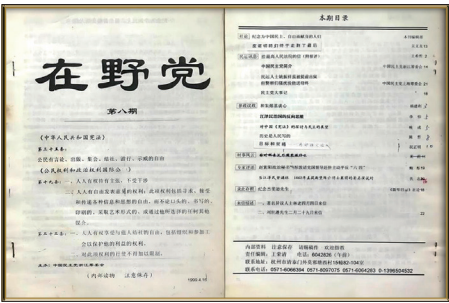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 年 5 月 24 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 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 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 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 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 年 6 月被捕，11 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 2007 年 9 月 14 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 年 2 月 1 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 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 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 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 11 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 年 6 月 19 日被捕，9 月 15 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 年 9 月 15 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 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权二年；2011 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权三年，累计服刑达 16 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 年 10 月 7 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 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 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 2002 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 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 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 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13 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 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 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 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 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组织框架介绍：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并设有日本分社，成员大多数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心有所信，向光而行

——郑存柱专访

记者：赵杰 林小龙 资料整理：林小龙 编辑校对：张致君 翻译：吕峰

在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曲折历程中，总有一群人始终以理想为灯，以信念为路。他们或沉默坚守，或挺身而出，在历史的激流中为时代留下注脚。郑存柱，既是1989年风云变幻中的亲历者，也是中国民主转型道路上执着的追梦人。从教育岗位到街头游行，从企业家到在野政治力量的一员，他的生命轨迹既见证了时代的撕裂，也体现了思想与责任的重量。

在这次深度专访中，郑存柱先生回望八九记忆，剖析民主理念的坚守与实践，坦露他对中国未来的深切期待。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民族振兴不可或缺的一步。

赵杰：郑老师，您好。我们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先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背景。您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合肥教育学院英语系，后来又获得了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您下海经商创办企业，而在此之前，您曾于1989年参与并发起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率领数百名学生赴京声援天安门事件，是安徽省学校与政府秘密谈判的代表之一。这样的经历十分特殊。能否请您先谈谈，当时您为何会带领学生走上街头？

郑存柱：那是1989年。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思潮活跃、改革呼声高涨的时期。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有了松动，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滞后。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是走不下去的。温家宝总理后来也提到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会付诸东流，甚至文革还可能重演。

八十年代后期，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城乡改革推进后，利益分配不均、下岗潮、物价上涨、权力寻租等问题集中爆发。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一些掌握批条权力的干部可以低价获得稀缺资源，再以高价倒卖，从中牟取暴利。这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陡增，也让社会充满不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与大学生成为要求政治改革的主要群体。1988年中共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让进程停滞。



当胡耀邦因改革失势被迫下台、最终去世时，全国学生的悼念情绪迅速转化为对政治改革的诉求。

我当时在安徽省教育学院任教。作为教师，我切身感受到教育体制的危机——教师纷纷辞职下海，教育质量下降，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日益减少。我们认为，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教育、社会、经济的问题都无法根本解决。因此，1989年合肥的学生运动，首先是由我们这些教育学院的教师与学生发起的。后来，我们成立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带领队伍赴京，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林小龙：那时的学生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毕业即意味着体制内的稳定职位。您是否意识到参与这场运动的风险？

郑存柱：坦白说，当时没有。我们那一代人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从小被教导“五四精神”“学生爱国运动”，认为青年学生有责任为国家的命运发声。我们相信政府会倾听理性诉求，绝没有想到会以武力镇压。

在合肥，我们学生游行持续了一个多月，全程和平有序，没有一家商店被砸、没有一块玻璃被打碎。学生甚至在十字路口协助交警维持秩序。所以当后来得知北京流血镇压时，我们都极度震惊与悲痛。六四事件改变了我对国家和体制的全部认知。

赵杰：事件之后，您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郑存柱：我当时被定为学校“首要分子”，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降两级。相比一些被判刑的同学，这算轻的。那段时间，社会普遍陷入恐惧，许多被处分的学生无法继续学业或就业。安徽的处理还算相对宽松，因为合肥是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当地政府对学生采取了“以教育为主”的态度。但对我个人而言，那次事件让我彻底认识到体制问题的根源，也让我走上了后来政治反思与行动的道路。

政治理念与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

赵杰：在“六四”事件之后，许多参与者都受到了处分，甚至入狱。请问郑老师，当时您为什么仍然决定继续投身政治改革？

郑存柱：那场事件让我彻底看清了问题的根源——中国的改革如果只限于经济层面，最终会陷入新的危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关键。

当年的我们，虽然年轻，但都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知识分子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哪怕冒风险，也不能沉默。

林小龙：您后来加入了中国民主党。能否谈谈这一决定的过程？

郑存柱：中国民主党在1998年6月25日正式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成立申请，很快就遭到镇压。但那次事件让我看到，仍有人在坚持八九年未完成的理想。

我本人是在2000年秘密加入的。当时，我已离开体制，在上海经商，拥有一定自由和资源。我与在海外的民主党组织取得联系，通过他们的渠道入党。

那时候，国内的政治环境仍然高压，加入这样的组织意味着风险随时可能到来。但我认为，如果连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都不站出来，那么中国就永远不会改变。

赵杰：加入后，您是否参与了党内的组织活动？

郑存柱：是的。我当时在上海，身边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有的来自教育界，有的在外企工作，也有在高校读研究生的朋友。

我们经常私下讨论政治、举办沙龙，传播民主理念。

那时互联网刚兴起，我们通过论坛、QQ群等方式联系彼此，比如“西祠胡同”“猫眼看人”等社区。很多人通过这些平台相识、交流、组织。

后来，我的几位同伴因传播资料或制作民主党宣传品被捕判刑。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条路不会轻松。



林小龙：那么，九八年“建党”运动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郑存柱：我认为那是对八九运动精神的延续。许多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其实都是当年的学生领袖或民运参与者。

他们经历过镇压，但并没有屈服，而是希望通过合法手段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我们并不想“推翻政权”，而是希望中共能依法承认公民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让国家真正回归宪法框架下的治理。

赵杰：在高压环境下坚持这些理念，需要极大勇气。是什么支撑您走到今天？

郑存柱：我始终记得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牺牲的年轻人。那一夜死去的人中，很多比我还年轻，他们没有机会再为中国发声。

作为幸存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活下去，并延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另外，我深信教育和法治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后来我在美国重新攻读法律，希望将来能把西方法治精神与制度经验带回中国。只有当权力被法律约束，人民才真正拥有尊严。

林小龙：所以您认为，中国的转型仍然有希望？

郑存柱：有。虽然过程艰难，但每一次思想觉醒、每一次反思，都是积累的力量。

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民不懂民主，而是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去实践它。

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声、敢于思考，政治改革迟早会到来。

赵杰：您认为《在野党》复刊有什么重大意义？

郑存柱：《在野党》的复刊象征着海内外中国民主力量重新连结的契机。长期以来，海外民主组织与中国

本土之间因环境、风险与交流受限，几乎失去实质性的对话与共同议题。而《在野党》的重新出版，使这种断裂的联系得以恢复：它不仅延续了当年海外民主运动与国内自由思想的精神纽带，也为被压抑的公共讨论重新打开了窗口。

杂志的设想是一刊两制——电子刊以海外为主，持续展现自由发声与国际倡议；纸质刊则以中国为重心，探讨国内现实与民众关切，使民主理念重新扎根本土。这种双线并行的方式，让《在野党》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第二次阻挡”，通过思想与文字把分散的精神力量再次凝聚在一起，为未来可能的民主进程保存火种与方向。

编者按：

人这一生，总要听几段沉重的话，记几件沉下去的事。风吹过历史的墙角，有些名字被灰尘掩埋，有些声音被风带走了。但真相这东西，就像老屋檐下的石头——你不去看，它照样在那儿，裂着缝，冒着水，年年岁岁。

本期采访的受访人，他不是写史书的人，虽未曾在中共政权下经历过牢狱之灾，但却亲手翻过那一页火热又疼痛的日子。他没站在权力的戏台上，却在风口浪尖上走了半生。他说的，不是煽情的段子，也不是激愤的口号，是一个读过书、下过海、扛过压的人，对命运、对体制、对良知的慢火回望。

我们刊发这篇访谈，不为制造波澜，也不为谁鸣冤。只是觉得，这个年代，该有一些不那么热闹的声音；该有一些人，不靠高声喧哗，也敢低声坚持。郑存柱的经历，不是传奇，是现实。他的沉默与不沉默之间，藏着许多人不敢说、不能说、想说又不知该怎么说的话。

你读懂多少，就带走多少。剩下的，时间会替我们记住。



Faith as Light, Walking Toward Hope — An Interview with Zheng Cunzhu

This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Zheng Cunzhu, a former educator, entrepreneur, and democratic activist, revisits one man's lifelong journey through China's turbulent struggle for reform. Born in Hefei, Anhui Province, Zheng studied English at Hefei Teachers College and later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literature fro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In 1989, as a young lecturer, he co-founded the Anhui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Federation, leading hundreds of students to Beijing in solidarity with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s.

Zheng recalls the 1980s as a decade of awakening — economic reforms had loosened the system's edges, yet political reform lagged far behind. Rising corruption, inequality, and bureaucratic abuse triggered widespread anger among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who hoped for change. "We believed reason and patriotism would be heard," he says, "but we never imagined the government would respond with gunfire." The tragedy of June 4th shattered his trust in the regime and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power and truth.

After being disciplined and demoted, Zheng left academia for business but never abandoned his political ideals. In 2000, he secretly joined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CDP) — a movement born from the unfinished aspirations of 1989 — advocating constitutionalism,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Through private salons and early online forums, he and his peers kept democratic discussions alive despite constant surveillance. "If educated people remain silent," he says, "then silence itself becomes complicity."

For Zheng, the core issue has never changed: without political reform, no economic achievement can last. He believes the foundation of a modern China must rest on education, legal restraint of power, and citizens' participation. Now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continues to research and promote democratic governance, convinc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fully capable of self-rule if given the chance.

Reflecting on the revival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magazine, Zheng sees it as a vital bridge reconnecting domestic thinkers and overseas activists, preserving the ideals of truth, freedom, and conscience. "It's not merely a publication," he notes, "but a vessel for memory and hope."

His story stands as a testament to perseverance — a reminder that amid fear and silence, faith can still light the way toward a freer and more dignified China.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锡安教会紧急代祷信

编辑：韩暎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翻译：刘芳

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

2025 年，新一轮的宗教逼迫正在中国各地兴起。今年 5 月，西安市广丰区的会众牧师陈惠强，被拘留和刑事羁押。专项整治宗教场所的行动再度席卷全省。6 月，当地市政府将锡安教会的会堂定性为“非法聚会场所”，并强行拆除。现时这样的情况，已持续 15 年。此外，全国也有不同教会正经历类似的逼迫和打压，甚至越发严厉。

锡安教会是秉持圣经真理信仰的中国家庭教会（非注册）。自 2007 年由当日执行会在北京所成立后，锡安教会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教会之一，会众人数约 1500 名左右。2018 年，教会在《宗教事务条例》修订之后，遭到当局的长期骚扰与逼迫。租用的场地被强制清场。2018 年 9 月 9 日，锡安教会正式被北京市民政局定性为“非法组织”。自 2018 年秋以来，全国已知近一百处家庭教会被关闭，牧长多人被带走、审讯、刑拘。

根据现场报告，教会原所在地区近期遭遇了严重的警方冲击。当局于 10 月 9 日早上突袭“锡安会堂”，同时对全国多个城市的“锡安教会”相关地点进行大规模同步行动。警方对于 40 个城市共计逾百名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进行上门带走与审讯。部分地区的弟兄姊妹被强行遣送回原籍。据了解，截至目前已有 150 人被捕（其中牧师与传道人 14 人），被行政拘留人数达 11 人。

自 2025 年 10 月 9 日起，锡安教会在全国各地约 30 名牧者和同工相继被捕或失联。下午，教会总负责人赵牧师的住处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突击搜查，书籍与电脑、手机被带走，赵牧师与同工至今下落不明。

截至目前，锡安教会在北京的主堂、上海、成都、广州、长沙、昆明、重庆、深圳等地的聚会点多数被查封。10 日晚上，警方再次进入教会办公室，查封奉献箱与财务账册。根据消息人士指出，当局以“非法集资”和“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准备对锡安教会展开刑事立案调查。

另据线报显示，教会在福建和浙江地区遭遇大规模搜查，并封锁通往上海的交通路线。昨天上午十时，浙江杭州锡安教会的王长老在住所被捕，当日下午福州教会同工杨弟兄被带走。

据目击者描述，警方以防疫名义进入聚会场所，查封讲台、圣餐桌、投影仪与电脑，并带走多名信徒。现场有姊妹试图录影，但手机被没收。

锡安教会同工呼吁主内众教会为此次逼迫紧急代祷，并求主保守赵牧师、陈惠强牧师、王长老、杨弟兄及其他被捕与失联同工的平安与信心。愿主赐下智慧，让教会在苦难中仍能见证真道，不致灰心丧胆。

“因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 4:17）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林前 12:26）

愿主亲自坚固祂的教会，使我们能在患难之日站立得住，忠于祂所托付的福音使命。

锡安教会牧区、长老团、堂务会

2025 年 10 月 11 日

Emergency Prayer Letter from Zion Church

In October 2025, China's largest unregistered house church—Zion Church—faced a sweeping nationwide crackdown. Police raided church sites in over 40 cities, detaining around 150 believers, including 14 pastors. Church leader Pastor Zhao and several co-workers remain missing after their homes were searched and property confiscated. Authorities accused the church of “illegal fundraising” and “disturbing social order.”

The Zion Church leadership calls on Christians worldwide to pray for those arrested and to stand firm in faith amid persecution, declaring that the Church will continue to witness truth even in darknes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我的兄弟邹巍

作者：小乔 国内来稿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翻译：刘芳



我和邹巍兄弟相识于十年前，而在此之前，我们于网络上的交流则更早，早在2008年我去国之前，邹巍兄弟就曾邀约我去杭城一见，那时我所在的城市上海距离杭州不过一、两小时的车程，且杭州是我“故地”，90年代我曾在杭打工两年，对这座风光旖旎、人文荟萃的城市颇多好感，无奈彼时我已被有司“重点关照”，非但有被从旅游地“押解”回沪的经历，还往往连累到当地接待的盆友被盘问等诸多不便，因此我对邹兄弟的邀约犹疑未决。

后来，我去国五载，又经历一番“曲折”回国，兜兜转转，在与网络“神交”多年之后，我才在2015年第一次见到了邹巍兄弟。邹巍兄弟衣着简朴，语言平和，对待朋友非常热心、真诚。那之后，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多数时候是通过网络。

邹兄弟曾是浙大毕业的高材生，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却多年来无法正常工作，生活陷于困顿。而在此困厄中，他依旧有着达观的生活态度和对人的真诚、善意与乐于助人。对于时局，他比我乐观，认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文明的潮流势不可挡，我等“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而我则在去国飘零五年后，回来再度面临故园的种种凋敝，尤其经历过2017年的重大打击后，又眼见着役情、封控等种种的末世疯狂，愈发地心灰意冷，深陷个人的渺小与无力感，只能在命运的潮流中随波逐流，以“躺平”面对无常。

邹兄弟每年主持着杭城朋友为各地难友的“送饭”，并时不时为公义挺身而出身体力行。之后我又去过杭城三四回，每一次邹兄弟总是热情地为我和朋友张罗安顿

住处，并尽力抽空陪我们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和运河两岸观光游览。未曾想去岁夏，邹兄弟只不过与其他几位朋友，就在孙中山先生发出上一段中的感慨“名言”之地散步，献上几束花，竟让他与另一位兄弟身陷囹圄，至今已有半载。

一月前的岁末之交，我于公历2024年的最后一日再度来到杭城，暂居于之前邹兄弟介绍认识的另一位好友家中，我们回忆起往昔与邹兄弟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担忧着他目下的处境，尤其他还是一位几年前曾做过癌症手术的病患者，虽说他手术后的定期复查显示预后不错，一直没有复发迹象，但他如今所处的恶劣环境……想起邹兄弟前几年每一年的岁末张罗着为杭城和其他地方的难友“送饭”，如今为他人抱薪者遭逢风刀霜剑严相摧，我们却不知能为他做些什么？不禁扼腕长叹。

第二天，朋友开车带我去一家养老院，探望了邹兄弟八旬高龄的老母，老人家神气清朗，对我和朋友的探望一再表示谢意。我们只能尽量安慰老人：邹巍有很多的朋友都很敬重、关注他，他没什么大事，很快就会回来。而我这样对老人说时，是“心虚”的，因为天知道邹兄弟这一次的劫难会是多久？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邹兄弟的父亲身体状况更不好，需要长期住医院，且神志已不太清醒，无法交流，因此去探望与否可能意义不大。之前邹兄弟长期在家照顾年迈父母，他唯一的妹妹则长期在国外工作，担负着家里主要的经济重担。

邹巍“出事”以后，妹妹回国将原本在家由邹巍照顾的母亲安顿进了一家条件不错的养老院，而父亲的身体状况，已经只适合长期住在医院里。由于要负担两位老人每月不菲的生活和医疗费用，妹妹不能放弃国外的工作，因此只得将两位老人安顿下来后，委托在杭城的朋友照顾、处理日常一些事宜。我暂时放弃了去医院探望邹父的打算，请那位朋友帮忙约了几位与邹巍的“案情”相关的朋友，一起吃饭、交流，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判断下一步的按情走向。

当我们吃完午饭，回到附近一位朋友的办公室茶叙时，不幸有司突然找上门来，进门就问：“你们这里哪位是上海来的？”我站起身答道：“我是。”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可描述”的“意外”状况，令我颇感觉诧异，毕竟在此之前我的三四次来杭未曾经历过如此待遇，包括最近一次与邹巍见面的2023年夏，那次我还与刚出“炼狱”不久的艳丽妹子同行，在杭城邹兄弟与其他几位朋友轮番

陪同，足足逛了五天……感谢有司那次的“逐客”之恩。（此处省略1000字）

总之，在我抵达杭城的翌日，新年元旦，我被有司下达了“逐客令”，便衣同志客气地开车“礼送”我至火车站，确认我订好了回程票后，说道：我们就不跟车站这边的同志打招呼了，免得对你造成不便……这次大概有些特殊情况不巧，下次适当的时候你可以再来。我不想与具体工作人员起什么冲突，但还是怀着郁闷的心情，在新年的第一天“被迫”离开了杭城。而我原本的计划也只不过在此停留两三天，只是想探望一下邹兄弟的父母，见几位朋友了解一下相关信息，原本也打算3号就离开。

今天是除夕夜，面对着美酒佳肴和亲朋的欢声笑语，我不禁又想到了蒙难的邹巍兄弟，不知道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过年了，可吃得上一口可口的饭菜？可有汤圆或水饺？就在去年春节，邹巍兄弟还在微信聊天时邀我带上年迈的父亲去杭城一游，说吃住他来安排，我因为父亲年迈，不欲在寒冷冬日里远行而错过了与邹兄弟见面的一次机会。

总以为来日方长，天涯未远，江湖再见有时。而今故人零落已无声，重来不见昔时容，空忆起“桃李春风一杯酒”，但愿不会是“江湖夜雨十年灯”。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邹巍兄弟，我知道，你是怀着乡贤这般的信念与使命感，自我选择了自己的路。我虽满心牵挂，也只能目送你的征程，并在心里默默为你祝福。兄弟，新年好！多保重！我们期待着你的归来。

My Brother, Zou Wei

I first met my brother-in-faith, Zou Wei, ten years ago, though our acquaintance began much earlier through online correspondence. Back in 2008, before I left China, he had invited me to Hangzhou—a city I knew well from my younger days and still held dear. Yet at that time, I was already under official surveillance and had been forcibly escorted back from trips before, so I hesitated to accept his invitation.

Years later, after living abroad and then returning to China through many twists and turns, I finally met Zou Wei in person in 2015. He was modest in dress, calm in speech, warm and genuine toward friends. From then on, we became close, speaking often online. A Zhejiang University graduate, Zou Wei had long been barred from regular employment for “well-known reasons,” living under hardship yet remaining kind, optimistic, and steadfast in his pursuit of justice.

Every year, he organized the “meal deliveries” for imprisoned or impoverished activists in Hangzhou and elsewhere, personally joining actions for public good. When

I visited Hangzhou several times, he always welcomed me with generosity and hospitality. But last summer, after he and a few friends quietly placed flowers at a memorial site for Sun Yat-sen, he was arrested and detained—simply for an act of remembrance. It has now been half a year.

At the end of 2024, I returned to Hangzhou once more. Staying with a mutual friend Zou Wei had introduced me to, we spoke of him often—his kindness, his humor, his devotion. We worried about his health, for he had undergone cancer surgery a few years ago. Though recovery had gone well, the prison conditions he now faces must be harsh. I later visited his elderly mother in a nursing home. She remained clear-minded and grateful for the visit, and I tried to comfort her: “He has many friends who care for him; he’ll be fine and home soon.” But I knew those were words of fragile hope.

Soon after, I was questioned and expelled from the city by plainclothes officers—“for special circumstances.” On New Year’s Day, I boarded the train back with a heavy heart. Tonight, on New Year’s Eve, as families gather around warm meals, I think of my brother Zou Wei. Does he have food to eat? Warmth to keep out the cold? Just a year ago, he invited me to bring my father to Hangzhou for the holiday; I declined, not knowing it would be our last chance to meet.

We always believe there will be time—that the next spring will bring reunion. But sometimes, time closes its gates. Still, I know Zou Wei chose his path with conviction, carrying the torch of truth in a dark age. If there is no other light left, he himself becomes the light.

Brother, wherever you are—Happy New Year. Hold fast. We await your retur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左起邹巍、朱虞夫、徐光、陈开频

近百维权人士旁听邹巍案开庭未果 —维权者被非法关进法庭近 4 小时

作者：蒋戈（化名）国内来稿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Tomorrow 校对：熊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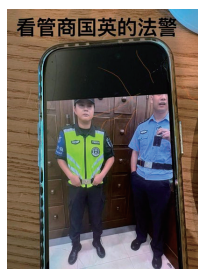
中国著名维权活动家邹巍所谓“寻衅滋事”案于2025年9月19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开庭，尽管当局已提前一天将吕耿松、陈树庆、毛庆祥、戚惠民等中国民主党人禁足在家，但朱瑛娣、梁丽婉、严忠良、严忠女、刘训连、王利民、沈利华、商国英等近百名维权者还是聚集在法院门口，并涌进法院二楼大厅，要求参加旁听。拱墅区法院的工作人员拒绝维权人士参加旁听，称旁听申请程序已经结束。大家质问法院当局为什么不提前公告通知，甚至连邹巍的妈妈也没拿到旁听证。当局无言以对。余杭区塘栖镇超山村的商国英提出要求在大厅设一台电视机直播庭审实况，却被关到隔壁的大法庭里，由五名法警看守，直到下午一点多才将她放出。商国英说，她在法院里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她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厕所只有一平方米左右大，座位上有脚铐，像看守所和监狱的禁闭室一样，这样的厕所有十个左右，连成一排。她说她从来没有听闻过这样的厕所，这次算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了。

邹巍八十五岁的母亲虽然没有拿到旁听证，但她在维权人士的帮助下，也参加了旁听。法官不许邹母说话，并威胁说如果她说一句话，就要把她撵走，邹母十分心疼儿子，但又为儿子感到骄傲。她说邹巍瘦了很多，但看起来很有精神，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条理清晰。律师为邹巍作了无罪辩护，辩护的要点有两个：一是邹巍接受采访是否属于“通过信息网络平台散布虚假信息”。他们认为接受采访属于被动行为，被采访者根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向采访者回答问题，编辑、取舍的责任都在采访者一方，这样的情况在我国的新闻报道中是常见的；二是邹巍所说的信息是否虚假。检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邹巍所说的信息是虚假的，而恰恰相反的是，许多信息所涉的当事人能证明邹巍所讲的都是事实。邹巍母亲盛赞两位律师，称他们很出色。

开庭前一天，邹巍向拱墅区法院提出了《要求公开审判并启动网络直播》的申请。他认为，既然起诉书认定他“通过海外媒体自由亚洲电台等信息网络平台，散布虚假信息，涉嫌寻衅滋事”，那么，他的案子就应该公开审判并启动网络直播，因为自由亚洲电台属于美国国会出资设立的新闻单位，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应依法依规直播。

邹巍同时还提出，他的父亲、母亲年纪太大，他的妹妹又不在国内，不能旁听庭审。但他自幼在杭州长

大，在杭州有很多朋友。因此希望他的朋友能够旁听庭审。他要求法院“当我的朋友们前往法院的时候，希望贵院严格按照刑诉法庭审公开的原则，不得阻碍他们旁听庭审，并且要保证足够的旁听席位。但邹巍的申请不但没有得到法院的同意，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并将要求电视直播的商国英非法拘禁达4小时之久，闹出了法庭成为囚笼的丑闻。



Nearly 100 Activists Blocked from Zhou Wei's Trial; One Detained Inside Court

Hangzhou, China—On September 19, 2025, the trial of rights activist Zhou Wei, charged with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took place in Hangzhou's Gongshu District Court. Nearly 100 supporters were denied entry, including Zhou's 85-year-old mother. Activist Shang Guoying was detained for four hours after requesting a live broadcast. Zhou's lawyers entered a not-guilty plea, arguing his interviews were not crimes and his statements were factual. The court's refusal to allow public access exposed China's deepening judicial repress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拆穿中共谎言

作者：周恒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刘芳 校对：李杰

最大的谎言当属共产主义。它打着公有制集体所有的旗号，通过革命和计划经济来实现消灭私有制、剥削和阶级的目标。真相是一群怀揣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的人，挑唆穷人用公有制名义“合法”抢夺私人财产。抢来的私人财产，最后被有分配权的少数人占有，而广大群众得到的只剩下穷困和痛苦。在1872年第一国际大会上，巴枯宁质问马克思：“如果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新的政权，如何避免成为新的压迫阶级和剥削工具？一旦革命者掌握权利，他们必将脱离群众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即使打着无产阶级旗号，也会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继续压迫人民。”愤怒的马克思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赶出了第一国际。哈耶克认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就是地狱。通往乌托邦天堂之路上虽然铺满了鲜花，但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共产主义自诞生以来直接或间接害死上亿人，它的幽灵现在还在毒害全世界。

中共宣传的谎言：李大钊是爱国烈士，他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真相是李大钊是苏联派驻中国的高级间谍，他出卖中国利益，服务苏联。张作霖在苏联使馆里查获了李大钊通苏卖国的大量证据。

中共谎言：土地革命的目标是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真相是共产党要在中国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公然叛国、出卖国家利益。中共革命经费一部分来自苏联，另一部分来自抢劫绑架诈骗和杀人。贺龙、澎湃、方志敏是进行这些犯罪行为的人物。

中共谎言：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中共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真相是国民政府军队围剿红军，红军溃败向西北逃亡，目的是去北方边境与苏联会合，背靠苏联分裂中国。至于抗日，实则是“一分应付，两分宣传，七分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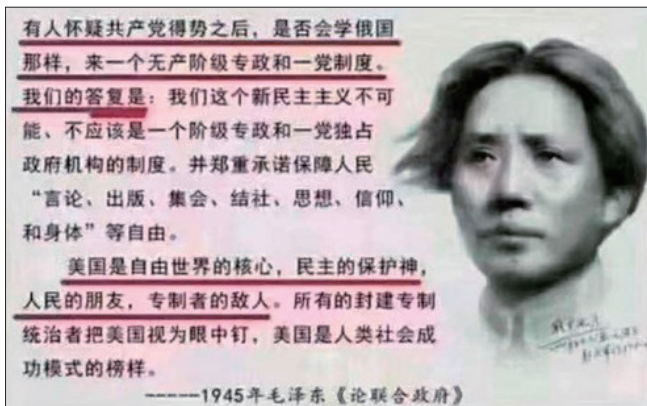
中共谎言：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一人一票，官兵平等，中共将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它蛊惑和欺骗了无数仁人义士抛头颅、洒热血，帮助中共打赢内战。现在看来，那些人为中共白白牺牲了。虚假宣传欺骗了大量的中国人，也欺骗了延安美军考察团。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杜鲁门政府停止军事援助国民政府。真相是延安选举只是形式，选举结果全部内定。中共党员王实味发现中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后，发表文章批评和质疑中共言行不一，被秘密处决。中共军



队还在南泥湾种植鸦片筹集军费，毒害中国人。

中共谎言：国共内战共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真相是苏联武器装备援助不断，美国停止援助国军。日军投降之后，大量技术军官直接编入共军部队参与内战。内战初期的关键战役中，中共军队毫无人性使用老百姓当挡箭牌和筹码来换取胜利，使得战略天平逐渐扭转。例如华东战场孟良崮战役时，把地主富农押解在前面冲锋，国军官兵不忍射杀百姓放弃战斗。东北战场长春围城战中，为了防止守成国军化妆潜逃出城，中共射杀任何出城人员，这个命令导致60万长春城中百姓饿死。

中共谎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真相是金日成首先指挥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侵略韩国的战争，联合国军随后进入朝鲜半岛将朝鲜军队赶回中朝边境，联合国军无意入侵中国。此时斯大林因为害怕引起三战不想出兵朝鲜。毛泽东一想要做共产国际的话事人，二想借刀杀人把内战投降的大批原国军将士消灭在朝鲜战场，于是派志愿军入朝作战。联合国军有制空权，装备后勤全面领先。在朝战中对志愿军是降维打击，双方战损比差距巨大，每一次战斗都是志愿军尸体堆成山。不是志愿军英勇也不是毛泽东彭德怀指挥艺术高超逼迫美



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停战，而是美国国内高涨的反战呼声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停止战争。

中共谎言：人民军队忠于党。真相是中国军队不属于人民。人民军队应该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党的军队应该叫党卫军而不该叫人民军队。

中共谎言：为人民服务口号。真相是共产党只为权贵服务。人民是供养者，权贵才是服务对象。

中共谎言：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真相是西方反对的是独裁中共，不是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等于中共，中共不等于中国。这句话中的“我”字是中共特权阶级不是中国人民。

教育领域中共宣传的谎言是“一切为了孩子、让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真相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接受中共洗脑的应试教育，这些孩子们热爱中共，服从命令，服从集体，抵制个性，否定质疑的声音。他们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下失去了童年的快乐、个性和创新精神。大量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而权贵家族的子孙从小接受西式教育，长大去欧美留学深造，再返回中国接父母的班。

医疗领域中共宣传的谎言是“中国政府关注每一个公民的生命，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政治私利”。真相是得大病的普通人治病就家破人亡，没钱的病人就被医院停药赶走，要么等死要么立即跳楼自杀。所谓的医保只是玩着先涨价再报销一小部分的把戏，根本不能保障穷苦大众的医疗需求。而中共高级干部却住在高干病房享受免费医疗，他们甚至可以肆无忌惮的将普通人的器官移植给自己延长寿命。中国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都用在中共高级干部身上。

养老领域中共宣传的谎言是“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人人平等，按劳分配”。真相是中共欺骗独生子女家庭数十年后，把当初的承诺扔进废纸篓，让他们自己解决养老问题。几代中国农民交了几十年公粮支持中共政权，换来的是一个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这点钱只够买米。大多数城市工人交了十五年社保换来一千多元养老金。而中共官员的养老金高的离谱，级别越高养老金越高。每年社保基金的开支绝大部分给了人数占比最少的高级官员。现在社保基金入不敷出，中共又是延迟

退休年龄又是增加社保年限缴费至25年，真是敲骨吸髓，贪得无厌，毫无廉耻。

法治领域宣传的谎言是依法治国。真相是整个中国宪法都是摆设。人民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只是写在宪法里，全部被剥夺。所有上法庭案件的审理判决，全部由各级领导暗地里决定，依法治国依据的是中共领导的看法：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看关系。

天安门学生暴动事件、香港回归的承诺、加入WTO的承诺、汶川地震捐款、一带一路战略、新冠肺炎疫情封控、对台政策、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寸土不让、同工同酬、勤劳致富、全民小康、无偿献血、器官移植捐献、民族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新闻媒体、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倒查国有资产流失30年等等全都是谎言和欺诈！谎言让富人觉得钱是自己的，穷人觉得国家是他们的。为了阻止真相传播，中共很早就兴建网络防火墙阻止国际互联网接入中国。如今被奴役的人民，长期接受中共洗脑，依然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美国总统林肯先生说：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是绝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全世界热爱自由、和平与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拆穿中共谎言，传播事实真相，推翻中共独裁，再造宪政共和，还中国人民以自由，还世界人民以和平！

Expose the Lies of the CCP

The greatest lie is Communism itself—a false promise of equality that led only to slavery and death. Under the banner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the CCP seized private property, created a privileged ruling class, and enslaved the people it claimed to liberate.

Every major CCP narrative is built on deception: Li Dazhao was no patriot but a Soviet agent; the Land Revolution served Moscow, not peasants; the Long March was a retreat, not heroism; the Yan'an "democracy" was a fraud; the Korean War was Mao's ambition, not defense. Its army serves the Party, not the people; its slogans of "justice" and "prosperity" hide corruption, oppression, and fear.

Today, lies fill every field—education, healthcare, pensions, and law—while truth is trapped behind the Great Firewall. But as Lincoln said,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The world must unite to expose the CCP, speak truth, and restore freedom and dignity to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共罪行

——秩序的崩溃

作者 / 编辑: Gloria Wang

责任编辑: 胡丽莉 翻译: 何兴强 校对: 李杰

历史背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 国共分裂, 中共转入农村, 以农民为基础展开武装暴力行动。

1927—1930 年间, 中共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等地建立所谓的“苏维埃根据地”, 其中核心政策就是“打土豪, 分田地”。

1930 年前后, 随着中共控制区扩大, 针对地主的运动变得更为激烈, 目的是削弱传统的土地阶级结构, 企图以此获取农民的支持。

中共为达目的, 争取民众盲从, 在部分地区的行动导致激烈暴力, 地主阶层被严厉清算, 秩序瓦解, 社会矛盾加剧, 甚至中农也受到波及, 引发混乱。

社会因斗争被撕裂, 群众斗争极端化, 地主不仅失去土地与财产, 很多人遭到公开羞辱、殴打甚至处决。人际矛盾变得尖锐, 村落内部的亲戚、邻里之间因为“划阶级”而互相揭发、报仇。还引起社会心理创伤, 许多地主家庭成员, 包括妇女、儿童均被牵连, 造成深远的社会阴影。

此举使得阶级仇恨制度化, 土地革命把“敌我矛盾”引入农村生活, 形成了长期的“阶级划分”思维。后来延伸到“整风运动”“土改运动”“文革”, 阶级斗争思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长期基调。造成伦理秩序破坏, 传统社会中的长辈尊重、宗族维系, 被“革命正义”取代。年轻贫农在“斗争大会”上可以公开辱骂、惩罚年长地主, 颠覆了传统伦理。这种做法虽削弱旧秩序, 但也带来道德真空。

中共为达到自己的短期利益, 不惜用不正当手段使贫苦阶层分得土地, 从而出于个体利益支持中共。但这一行为付出的长远代价是: 农村内部矛盾激化、经济破坏、社会伦理被动摇, 并种下了长期“阶级斗争”的仇恨种子。

1930 年前后, 苏区斗争会规模庞大, 一个县动辄召集数千农民参加。地主在公开批斗后常被“没收财产+驱逐”, 部分被处决。学者估算自 1927—1931 年间, 在红色根据地被处决的地主、富农约 20 万—30 万人。数



字因地区不同差异极大, 有的县几乎全部地主被清算。

土地分配后, 农业总产量并未明显上升, 部分地区 1930—1931 年粮食产量甚至下降 10%—15%。主因是缺乏耕牛、农具, 战争环境不稳定。地主被消灭后, 农村信贷体系崩溃。过去地主经常向农民放贷, 农忙时提供种子、钱粮。打击地主后, 农民短期虽分田, 但缺乏资金与流动性。

这场“打击地主”运动的核心并非真正的社会公平, 而是中共巩固政权的工具。通过分田分地, 中共赢得农民支持, 借由没收地主资产, 补充其军事与政治资源。这是一场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斗争运动, 而非为百姓谋福祉。

农民在短暂分得土地后, 很快又陷入新的政治压迫之下。据中共自己统计, 1931—1933 年间, 江西苏区共重新分配土地约 1700 万亩, 其中大部分被军队和革命干部优先分得。普通农民虽一度得到土地, 但不久又在征粮、征兵与“再分配”中失去, 短暂的得益转瞬即逝。

中共打击地主的行为, 既非真正的土地改革, 也非社会公正的体现, 而是以革命之名行劫掠之实。它用暴力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秩序, 用仇恨摧毁了人伦与信任。这样的历史悲剧提醒我们: 任何以“公平”为名、却建立在仇恨与暴力之上的运动, 最终只会留下满目疮痍。

由此可见, 中共的此举造成社会秩序的崩毁及恶劣深远的影响, 此为第一罪。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被计划生育夺走的孩子

——一个中国母亲的亲身经历与控诉

作者：王乔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程铭 校对：李杰



我来自中国山东的一个沿海城市。2000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我们彼此深爱，相伴走过两年后，于2003年结婚，2004年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们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孩子，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内心满是喜悦和满足。我们曾多么希望能拥有更多的孩子，给他一个兄弟姐妹，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完整和幸福。

然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却强硬地割裂了我们的愿望。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2008年，我被迫接受了节育措施，放置了节育器。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制度的强制与控制。

命运似乎给了我们一次意外的惊喜。2014年12月16日，我发现自己似乎怀孕了，验孕结果为阳性。第二天，我赶去医院做B超，检查结果显示已经怀孕六周。医生告诉我，节育器已经意外脱落到了宫颈口。我难以形容当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生命，是一个奇迹。

我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甚至打算逃离城市，躲到偏远地区去避开检查。然而，我们还来不及行动，就被街道办事处和村里的妇女主任找上门。他们表示接到举报，说我怀了“二胎”，必须立即堕胎。他们称这是“国家政策”，必须执行，拒绝任何协商。

我苦苦哀求，表示愿意缴纳罚款或接受其他处罚，只求留下孩子。但他们没有丝毫人情可讲，反复强调“这是国家政策，你必须配合。”随后几人强行将我从家中带走，拽上车，将我拉到了医院，我请求打电话给丈夫，也被拒绝。在没有我的同意、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

情况下，我被按在手术台上注射了麻药，就这样我的孩子被他们无情的剥夺了生命。

更荒谬的是，几天后，我回到工作的单位，但是单位的领导说我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即使已经堕胎，依然要被辞退，理由是“没有主动上报怀孕信息，态度恶劣”。2015年1月8日，我无奈办理了失业登记，只为能够领取一点失业补助金来维持生活。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女性，被计划生育政策无情践踏的亲身经历。

当我后来来到美国，看到这里的家庭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孩子、生几个孩子，不会被政府强制剥夺做母亲的权力，我内心充满感慨。在这里，生育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不是被国家随意剥夺的工具。

回顾我的经历，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权力干预个人身体与家庭自由的极端表现。这项政策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家庭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许多女性被强制堕胎、结扎甚至终生失去了生育能力。而所有的痛苦，至今从未有人为我们承担责任、作出道歉。

我对这项政策充满不满与愤怒。一个国家如果连最基本的生育自由都无法保障，又如何谈人权？如何谈法治？

这段经历永远地改变了我，它不仅夺走了我未出生的孩子，也击碎了我对祖国的信任。

今天，我愿意将这段经历写出来，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希望世界听见那些曾经被迫沉默的声音。

A Child Taken by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 mother from Shandong recounts how China's one-child policy destroyed her family. In 2014, after discovering a long-awaited second pregnancy, local officials dragged her to a hospital and forced an abortion without consent, citing "national policy." She lost her baby and later her job. Now in the U.S., she calls the policy a brutal viola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demands the world hear victims of China's state-imposed cruel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实名举报中共投毒中国儿童，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调查

作者：赵杰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程铭 校对：李杰

陈丹青曾说：一个社会有三大底线行业。一教育，二医疗，三法律。

只要社会多不堪，只要教育优秀公平，只要医疗不黑暗下降，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只要法律秉持正义，社会不良现象就能被压缩到最小.....

如果三大底线全部洞穿，就是人间炼狱！

我看到这句话，我曾好几次掉下眼泪，因为我知道我深爱的国家正在被一群扮演天使的魔鬼掌控。它们正在洗脑儿童的思想，它们教你记住历史的苦难，却忽视无数现实中的苦难。

今年暑假结束，9月1日开学当天，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学生们在食堂用餐时发现饭菜突然变了：米饭夹生、菜品难吃、分量不足，吃不饱，吃饭时间只有20分钟，学校还禁止点外卖，学生根本没有选择。甚至有学生吃完后拉肚子。

很多学生把情况反映给父母，家长们向投诉平台反映，并点名新的食堂承包商——洛阳弘义食品分公司。事件很快引起热议，随后更多学校家长也爆料：洛阳实验高中、洛阳理工附中、洛阳外国语学校、第十一高中、第十三高中、河科大附中等，都有孩子反映饭菜难吃、乱收费。背后几乎都指向同一家公司：洛阳弘义。

更可怕的是，这家公司居然是2025年4月22日才成立的，短短几个月就承包了洛阳这么多学校的食堂？这是公开招标还是政府指定？背后是否有利益输送？

无独有偶，9月15日，上海多校学生餐也被曝出“虾仁、鸡蛋有臭味”，被紧急撤换。背后供应商绿捷公司每天为50万学生供餐，家长长期投诉油炸食品过多、质量差、异物混入，还深陷多起法律纠纷，就是这样的公司却能掌控整个上海学生餐市场。

从洛阳到上海，这不是偶然，而是全国一盘棋的垄断。很多家长甚至绝望地说：“没有绿捷，还会有红捷、蓝捷。”

更讽刺的是，中共整天宣传所谓爱国教育，让学生观看《南京照相馆》、《731部队》这些反日电影，把政治叙事当成头等大事，却在孩子们最基本的健康问题放任腐败。孩子吃得饱不饱、健不健康，他们根本不在乎。

想想2022年疫情封控时，各地出现的乱象：一夜之间注册的公司承包小区物资，价格翻三倍，甚至卖出臭肉。投诉无门，群里说真话就被禁言。学校同样是封闭

场所，一旦被某个企业垄断，家长和学生没有任何话语权。绝对的垄断就是绝对的腐败。

这不是偶发事件，这是中共体制的问题。全国一盘棋会反复出现这样的事情。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这个独裁体制下，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是这个部门的皇帝，没有监管，普通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必然滋生腐败。

我们这些逃离中共魔掌的人，非常清楚这个体制的邪恶和贪婪。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它们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众。中共体制一日不倒，中国人民就永无宁日。

今天我实名举报：中共正在用腐败、垄断和劣质食物，毒害中国的儿童。孩子是民族的未来，他们正在被这样一个独裁体制一步步摧毁。

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儿童保护组织介入调查，并发起抗议。

只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声，才能揭开真相，追究罪责。为了孩子的饭碗、为了中国人的未来，真相必须被揭露，罪恶必须被清算。



Whistleblower: CCP Poisoning China's Children

A whistleblower accuses the CCP of poisoning Chinese children through corrupt, monopolized school-meal programs in cities like Luoyang and Shanghai. Newly formed companies serve unsafe food under official protection. The report urges the UN and global community to investigate, hold those responsible accountable, and defend children's health and future from the regime's systemic corrup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胡洋 / 张雅笛被捕案看中共对海外言论的监控

作者：张致君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熊辩

2025年7月26日，上海浦东机场的门口走过无数旅客。他们推着行李箱，怀里抱着孩子，神情疲惫，却满心期待着家里的饭菜和床。胡洋也是其中之一。他从荷兰飞回来，准备探亲。警察把他带走。罪名叫“寻衅滋事”。行李箱还没来得及打开，钥匙还揣在兜里，给朋友买的礼物也没有送到，他的旅行就结束了。他的妈妈在胡洋被羁押35天后在推特上发帖求助，不到一天就被强制删帖。

四天之后，2025年7月30日，英国留学的张雅笛也回国。她的罪名比胡洋更重，叫“危害国家安全”。她甚至没有机会把在伦敦买的纪念品送给父母，就消失了。她的妈妈约见了709律师汪天勇寻求法律援助，会面时，律师汪天勇就被三名不明人士带走。

两个年轻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的未来像机场的玻璃一样，被轻轻一敲，碎成无数片。

胡洋的“罪行”或许是写下几句话；张雅笛的“罪行”或许是编辑几篇文章。

他们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贪污，也没有诈骗。他们做的事情，是最轻的，却被赋予最重的罪名。

在中共的字典里，说话是一种危险，说错话是犯罪，不说话是安全。

于是一个国家里，语言像石头一样沉重。一个眼神、一句玩笑、一个词语，都可能变成铁镣。

古代的文字狱是诗里的一个字，史书里的一个典故。今天的文字狱是推特上的一条帖，是微信群里的一句话。

过去，皇帝怕文人讽刺。现在，中共怕留学生说话。

过去，宫廷里的人噤若寒蝉。现在，海外的留学生也开始自我审查。

中共文字狱的范围，不再是皇宫，也不再是长城以内，而是扩展到整个地球。

极权最大的本领，是制造恐惧。恐惧不在监狱里，它在机场的大厅，在留学生的课堂，在家庭的电话那头；恐惧不在警察的手里，它在父母的叮嘱里：“别乱说话，回来小心点”；恐惧不在法律条文里，它在聊天记录记录的删除键里，在朋友圈的沉默里。

胡洋和张雅笛被抓，不只是抓了两个人，而是把恐惧推给了无数人。每一个海外留学生甚至旅居海外的人都明白：你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



一个政党强大时，不会害怕几句话。一个政党脆弱时，才会把几句话当成威胁。

中共害怕的不是胡洋，也不是张雅笛，而是他们背后的自由世界。害怕他们在荷兰的课堂里学到什么，在英国的社团里讨论什么。害怕他们的声音穿过国界，带回给国内的朋友，撕开一条小口子。

真话就是这样的东西，一旦漏进来，再多的铁墙也挡不住。

在自由的世界里，人们难以理解这种恐惧。为什么一个留学生说句话，就能让一个政府颤抖？

这是因为，中共的权力不是靠选票赢得的，而是靠控制语言维系的。一旦语言失控，政权就会摇晃。

所以 they 要跨国镇压，把海外的声音也堵住。这不是他们的自信，而是他们的虚弱；这不是他们的力量，而是他们的恐慌。

罗岱青与张冬宁的被捕并不是开始，胡洋与张雅笛的被捕也非结束。

中共的长臂管辖想让更多的留学生不再敢说话。

每当课堂上涉及中国问题，他们要低头做笔记；饭桌上朋友聊到政治，他们要笑笑不接话。中共想让他们因为害怕而沉默，让他们害怕手机里的记录，害怕回国的路。

沉默像传染病一样蔓延，会把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变成灰色的影子。

一个政权手里有枪炮，却害怕几个学生的笔；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却害怕几个年轻人的推文；一个党统治十四亿人，却容不下两名留学生的声音。

荒诞吗？是的，但这就是现实。

现实荒诞到，我们笑的时候，笑声里有泪。现实荒诞到，我们哭的时候，眼泪里有怒。

胡洋和张雅笛的消失，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他们的名字被写下，他们的故事被讲述，他们的遭遇被传播。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抵抗；每一次传播，都是一次共鸣。

自由的力量，不在于一个人，而在于无数个声音的叠加。声音可以被堵住一时，却永远不能被消灭。

在黑暗中说话，是需要勇气的。在恐惧中坚持，是需要信念的。

胡洋无罪，张雅笛无罪。言论无罪，自由无罪。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我们要让中共知道，我们不会沉默的。

声音要穿越国界，像风一样。风吹过围墙，吹过铁窗，吹进每一个心里。

当无数声音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共鸣。这共鸣，将比恐惧更强大。

我们和自由同在。

我们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据报：荷兰留学生胡洋
暑假回国被捕
近三个月仍无法会见律师

From the Arrest of Hu Yang and Zhang Yadi: The CCP's Global War on Speech

In July 2025, two young Chinese citizens—Hu Yang, returning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Zhang Yadi, a student in the UK—were arrested upon arrival in China. Their alleged crimes: "picking quarrels" and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ir only real offense was expressing opinions and editing articles abroad. Within hours, Hu Yang's mother's plea for help on Twitter was deleted, and Zhang Yadi's lawyer was detained. Two names vanished—but the fear they left behind spread across borders.

Their cases reveal a regime terrified not of violence but of words. In China, speech has become a crime; silence, the only safety. The CCP's reach now extends far beyond its borders, turning airports, classrooms, and even family conversations into zones of self-censorship. Parents whisper warnings to children: "Don't talk politics when you go home." The Party's control of language is the control of thought—its survival depends on suppressing truth.

This new "literary inquisition" no longer targets scholars or poets but ordinary students abroad. Every deleted post, every banned account, is a modern form of exile. The Party fears the free world's influence: the open debates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the democratic ideals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returning students might carry freedom's spark back home.

The arrests of Hu Yang and Zhang Yadi are not isolated incidents but part of the CCP's global campaign of intimidation—its "long-arm jurisdiction." It aims to silence the diaspora, to make Chinese students abroad police themselves, to turn fear into habit. Yet repression reveals weakness, not strength: a government confident in its legitimacy would not tremble at a tweet.

In the free world, it is hard to comprehend how a few words can threaten a state that boasts nuclear weapons and controls 1.4 billion people. But the CCP's power is built not on consent but on fear. Once truth slips through the cracks, no firewall can contain it.

The courage of Hu Yang and Zhang Yadi endures in every retelling of their story. Each voice that refuses silence becomes an act of resistance. Freedom's strength lies not in one hero but in countless echoes refusing to fade. Words, like wind, can cross any border—and one day, that wind will sweep away the fea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2025 年中国迎来近些年最穷“黄金周”

——浅谈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因

作者：鲁慧文

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2025年中国国庆黄金周到今天就结束了，这大概是从有了“黄金周”这种说法以来，第一次反差如此强烈的国庆节——出行人次是近年来新高，经济收益却创下新低。从全年经济高峰期的“黄金周”直接跌入谷底，来得十分突然，没有任何征兆。无论是商家、国家、媒体，还是整个旅游行业，都被打得措手不及，毫无应对之力。

全国各大旅游城市依照惯例在黄金周上调酒店房价，这也是历年的常规操作。景区也提前做好准备，整个旅游行业都计划趁此机会“开门迎客”，狠狠挣一笔，把上半年经济低迷的损失趁热弥补回来。然而，大家都扑了个空。今年的游客像是商量好了一样——“趁机涨价的酒店？那就让它空着吧。”于是满街都是帐篷，一眼望去像加沙难民营，连成一片。景区门票超过20元的就不进去了，在大门口打卡拍照就算完事；饭店也不去了，要么泡面，要么点个便宜外卖。总之，大家像是达成了共识：绝对不掏钱。而在这种“不约而同”的行为背后，我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了。

这种“躺平式”或者“对抗式”旅行模式，今后也将更多体现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背后，反映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深层次的逻辑关系。虽然许多普通人未必能清晰地表达出来，但人是有感知的生物。如今在中国社会，哪怕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已经感觉到经济不会再上行了——大白话说，就是“没有希望了”。

这种“没有希望”的悲观情绪，正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开始抛售房产（北京十几万元一平米的房子近期甚至有一折出售的），开始不结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就到我这一代吧”），不生孩子，不卷孩子，



不追求上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却选择不读的人数比往年更多），不去电影院（今年黄金周电影院异常冷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拼多多都贵了，越来越多的人被列入失信名单，一种深沉的绝望笼罩着整个社会。一个信仰来生的民族，如今却苦笑着说：“下辈子我不来了。”

有学者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而这还远未到谷底。这无疑是个悲伤的消息。但中国经济的衰退，是无法阻挡、也无法逆转的。这艘建立在全民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经济巨轮，就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人们只能在惊恐中亲眼看着它坠入深海。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地步，表面上看，是习近平领导无能，中国与美国经济脱钩、外企撤出、青年失业等多重因素造成的（这些当然是助推器），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基因”决定了结果。它并非一个错误的经济方案，也不是某个班子方向不对，而是从制度的基因上就注定了短寿。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因。

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民主制度（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另一种是集权制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独裁或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社会资源如何分配的机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保障财产私有，强调公平分配社会经济成果，建立在民主、人权与相对公平的基础上运作。而独裁国家则是压榨型制度，每一层都尽可能吸走下层的经济收益，层层盘剥，最终使全民经济成果集中到最上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2%的人拿走98%的财富，98%的人分享剩下的2%”。上层只给下层留下一点“续命钱”，确保他们活着继续为上层创造更多经济价值。

这种制度自古如此。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全国土地、经济、粮食、珠宝，皆归统治者所有。这种中央集权制度自秦朝延续至今。结合现代高科技，中共更是集历代之大成，通过人口红利、极低的劳动报酬和极长的工时，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共的分配制度又将大量的经济收益聚敛于自身，只留下一点生存口粮给底层劳工延续生命。再辅以宏大叙事，让世界看到一个“繁荣的中国”，也让几代人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于是人们吃苦耐劳，发明了“996”“007”，拼命读书、拼命工作，相信“爱拼才会赢”“明天会更好”。

然而，当这种压榨型集权制度发展到极致，必然更加变本加厉。疫情之后，中国底层经济被彻底抽空，甚至连维持生存的口粮也被夺走。人们终于意识到——原来不是越努力越幸运。原来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可以不上班领工资，公务员坐牢也有工资，烟草局退休职工月退休金高达一万九，是普通人工资的数倍；原来自己交的社保是养别人的父母；原来大学毕业要去送外卖；原来“那茜”200分就能特招进名校；原来国有单位是家族世袭……越来越多的事实让老百姓明白，自己只是牛马，社会的财富与自己无关。

于是人们不再看新闻联播，不再相信国家通报，看清自己的生命、财产、工作都可随时被剥夺，看到法律的虚无，看到正义的失声——他们失望了，然后绝望了。

是的，这不是一两次经济政策失误的结果。底层的命运早已刻在中共集权的政治制度里。统治者攫取社会最多的财富，盛世时给底层留一口气；乱世或衰退时，连口粮也不留。这就是这种制度的本质。别忘了，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饿死四千多万人，而毛泽东每日仍有红烧肉。

人们必须明白：想要活命，想要生存权，必须废除这种压榨型政治制度，推翻中共专制体制，推翻中央集权，让人们重新掌握生路。

China's Poorest "Golden Week": When Political DNA Shapes Economic Collapse

China's 2025 National Day "Golden Week" ended as perhaps the most paradoxical in history—record-breaking travel numbers but the lowest economic returns in years. Hotels raised prices expecting windfalls, only to find rooms empty as tourists camped outdoors and refused to overspend. People avoided restaurants and costly attractions, signaling not only frugality but disillusionment. Beneath this quiet rebellion lies a collective awakening: citizens are losing faith in both the economy and the system that governs it.

The "silent strike" of Chinese consumers reveals a deeper truth—that political structure determines economic destiny. The downturn is not simply the product of mismanagement, decoupling from the U.S., or youth unemployment. It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China's authoritarian design. Political systems are the genetic code of economic systems. In democracies, wealth is distributed through open markets, legal safeguards,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autocracies, power concentrates wealth upward, creating a pyramid where the few consume the labor of the many.

Under the CCP, this centuries-old model of extraction has been modernized. From the "996" work culture to monopolized industries, China's growth relied on cheap labor, long hours, and propaganda-fueled nationalism. The result: prosperity for the Party elite and exhaustion for ordinary people. After COVID-19, the base of this economic pyramid collapsed—citizens now face stagnant wages, unemployment, and vanishing hope.

Disillusionment runs deep. Once, people believed "hard work brings success." Now, they see the privileged live on unearned salaries, officials retire with pensions ten times higher than workers', and corruption remains systemic. The myth of upward mobility has shattered; social despair has become a national mood.

China's economy, much like the late Soviet Union's, is imploding under its own political DNA. Centralized power breeds inefficiency, fear, and moral decay. Even as propaganda boasts of progress, the reality is clear: wealth and power remain locked within the Party, while the public bears the cost of its failure.

The "Golden Week" of 2025 has become a mirror reflecting the truth—an empire of concrete towers built on sand. Until China dismantles its extractive political order and restores power to the people, recovery is impossible. Economic reform without democracy is a road that leads only deeper into collaps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的“K 签证”

——一场关在防火墙里的“国际化”闹剧

作者：冯仍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Tomorrow

根据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境内外籍人士总数为84.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06%。这意味着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几乎看不到外国人的影子。这个比例比印度、日本、乃至许多非洲国家都低，只略高于朝鲜。换句话说，中国几乎是最“单一种族”的大国。

然而，就在这样的现实下，北京却在今年10月1日高调推出所谓“K签证”政策，宣称要从全球吸引理工科（STEM）领域人才，打造“中国版H-1B签证”。按照宣传口径，这是一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举措，目的是和美国争夺科技人才。

但讽刺的是，这项签证政策刚一宣布，舆论几乎全线翻车。微博话题“#K签证会让外国人抢走我们的饭碗吗#”登上热搜，评论区成了排外与怨气的宣泄场。人民日报不得不亲自下场“科普”，试图挽救形象；然而网民的愤怒却并非因为他们“仇外”，而是因为他们早已被体制教会了“封闭与敌意”。

中国政府多年来筑起的信息防火墙，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几乎没有与外部世界直接交流的机会。外国人稀少，外语教育僵化，海外媒体被屏蔽——于是，整个互联网舆论生态自然滑向一种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于是，当K签证出现时，这种“防火墙下的国际化”就成了一场闹剧：民众害怕外国人会“侵占中国”，甚至出现“防止印度化”“五胡乱华重演”的荒诞论调。

但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K签证本身，而在于一个长期被禁锢在谎言体系里的社会。一个连自己公民都不信任的政权，又凭什么能吸引外国人才？

看看现实：同样的时间，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18.9%，而且这还是“优化后”的数字；22岁的女留学生张雅笛因为参与“挺藏会”活动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可能面临十五年刑期；网络博主卢晨风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被封号、被围剿。——在这样一个“言论可定罪”的国家，外国人真的敢来吗？

即便他们来了，又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没有WhatsApp、没有YouTube、不能自由上网”的信息孤岛。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成问题，又何谈创新？

事实上，K签证并不是“开放”的象征，而是当局焦虑的产物。它不是为了吸引人才，而是为了制造一个“我们仍在开放”的假象，好让国际投资者相信这个体制依然稳定、可靠。但对内，它照旧封锁信息、打压异



见；对外，它竖起笑脸，企图在全球舞台上争取科技与资本。

这是一场典型的“双面开放”：外向的面具，内向的灵魂。

因此，中国真正需要的“K签证”，并不是发给外国人的，而是发给自己的青年。

让他们能够自由迁徙，不被户籍束缚；能够自由表达，而不被删帖封号；能够自由选择信仰，而不用担心被指控“邪教”；能够凭努力改变命运，而不是靠“关系”与“背景”。

只有当中国青年首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不是“被统治的对象”，中国才有资格谈对外开放。否则，无论发出多少签证，建多少“人才引进园区”，都只不过是——在一堵更高的墙上贴一张“欢迎光临”的标语。

真正的开放，不是让外国人来，而是让中国人走出去、说真话、活得像人。

K签证能解决的，只是数字；制度改变的，才是命运。

China's "K Visa": A Facade of Openness

China's new "K Visa," promoted as a tool to attract global talent, instead exposes the emptiness of its so-called openness. In a nation where speech is punished, the internet is walled off, and citizens live in fear, no foreign expert will bring innovation. True openness will come only when Chinese people themselves are free to think, speak, and move without restrain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三年后的回望：贵州“9·18”大巴事件

作者：冯仍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韩瑞媛 校对：林小龙 翻译：吕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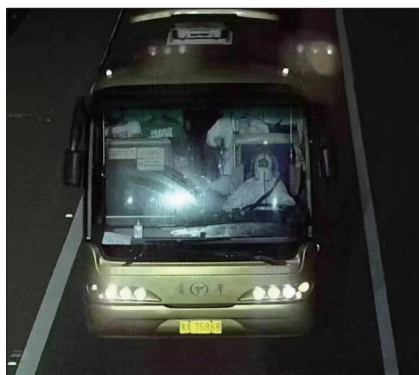
2022年9月18日凌晨，贵州贵阳一辆运送密接人员的大巴翻车，27人当场遇难。三年过去，这场惨剧依然刺痛人心。

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交通事故”。它的根源在于荒谬至极的“清零政策”——为了掩人耳目，凌晨强行发车；为了执行命令，让司机疲劳驾驶、身穿防护服。为了维持所谓的“社会面清零”，把活生生的人当成可以随意搬运的物件。结果，27条本不该消失的生命，硬生生被政策碾碎。

官方的道歉，根本不是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对体制的维护。说是“工作有纰漏”，下次会“更严密”。这意味着齿轮依然冷酷运转，牺牲只是继续被吞噬。把这样一起政策导致的群死群伤，说成单纯的“安全事故”，无异于再次羞辱死者。

真正可怕的不是大巴侧翻，而是人们的顺从与无力。“唉，老实听安排吧”，成了他们最后的心声。这种盲目信任和被迫服从，正是体制乐于制造的麻木。可这一次，它换来的是死亡。

三年后再回望，我们必须说清楚：这是清零政策的罪恶，是体制冷血的代价！27人不是倒霉，他们是被活生生推上绝路的牺牲品。记住他们，就是在追问：还要多少生命，才能让荒唐的政策停止？



Three Years Later: A Look Back at the Guizhou "9 · 18" Bus Tragedy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September 18, 2022, a bus transporting close contacts of COVID-19 cases in Guiyang, Guizhou Province, overturned, killing 27 people. Behind this tragedy lay the deeper cause—the "zero-COVID" policy.

In the early hours of September 18, 2022, a bus carrying quarantined close contacts in Guiyang, Guizhou Province, overturned, resulting in 27 deaths at the scene. Three years later, this tragedy continues to pain the public's conscience.

This was by no means a mere "traffic accident." Its roots lay in the utterly absurd "zero-COVID policy." To conceal the truth, the authorities forced the bus to depar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o carry out orders, the driver—exhausted and clad in protective gear—was made to drive through the darkness. In the name of "social-level zero cases," living human beings were treated as objects to be moved and disposed of at will. The result was that twenty-seven lives, which should never have been lost, were crushed beneath the wheels of policy.

The government's so-called apology was not a gesture of respect for life, but an act of self-protection for the system. They said there had been "work deficiencies" and that next time things would be done "more carefully." Those words mean only that the bureaucratic machine will continue to turn coldly, and that sacrifices will go on being consumed. To call a tragedy born of policy merely a "safety accident" is to insult the dead all over again.

What is truly terrifying is not the overturned bus, but the obedience and helplessness of the people. "Sigh... let's just follow the arrangements," became their final words. That blind trust and forced submission are precisely the numbness the system cultivates. But this time, it led straight to death.

Three years later, we must speak plainly: this was the crime of the zero-COVID policy, the price of an inhuman system. Those twenty-seven were not unlucky—they were driven to their deaths. To remember them is to keep asking: how many more lives must be lost before such madness ends?

中共体制内人放弃体制的社会与政治逻辑

作者 / 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Tomorrow 校对：林小龙

在极权主义研究的经典框架中，个体与体制的关系一直被视为现代政治学与社会学的重要命题。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不仅通过恐怖与暴力维持统治，更通过制度化的组织方式与意识形态塑造，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阿伦特，1951）。中共体制正是此种极权模式的典型延续。

对于体制外的民众而言，中共的专制本质早已显而易见。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内的个体同样身处风险与困境之中。他们不仅是体制运转的执行者，更常常成为体制自我清洗与自我消耗的牺牲品。因此，分析中共体制内人为何更应放弃体制，不仅有助于理解极权体制的运作逻辑，也有助于揭示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动力。

一、共产体制的独裁本质与“绞肉机”效应

共产主义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职业革命家”与“先锋队党”的理论，为极权主义政党的权力垄断提供了理论基础（列宁，1902）。在这种体制下，个体必须服从组织，组织服从中央，最终所有权力汇聚于党与领袖之手。

在实践中，这种高度集权必然导致“绞肉机效应”。体制不仅通过物理暴力清除异己，也通过政治运动、党内斗争和思想改造，周期性地吞噬自身成员。苏联大清洗（1937）、中国的反右运动（1957）、文化大革命（1966-1976），均证明了即便是最忠诚的干部，也可能在体制的自我更新中被牺牲。正如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的恐怖并非仅针对敌人，而是针对所有人”（阿伦特，1951）。

因此，中共体制内个体的身份并非安全保障，而是悬在头顶的利剑。其存在本身意味着时刻可能被清算，区别只在于时间早晚。

二、列宁主义模式与虚伪合法性的延续

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但实质上严格延续了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所谓“民主集中制”不过是“集中”的代名词，党组织权威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强调“党要管一切”，这一原则延续至今。

从制度设计上看，中共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虚伪的双重结构上：一是形式上的民主与法治：宪法文本中写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至上等条文；二是现实中的党治独裁：一切权力最终归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

会，法律和宪政成为权力意志的工具。

正如林茨在《后极权主义社会》中所言：“在后极权体制中，法律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宪法沦为政治装饰”（林茨，1996）。中共体制恰恰体现了这一特征。体制内人被要求忠于宪法，却更必须忠于党，后者才是实际的安全与升迁保障。

这种虚伪的合法性结构，迫使体制内个体长期处于矛盾与撕裂之中。他们明知制度不公，却必须以维护制度为己任；他们寄望体制保障，却随时可能被体制抛弃。

三、掘墓人的历史逻辑

极权体制往往在其最鼎盛时期孕育自我毁灭的力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即为典型案例。他出身体制内，却在改革与开放的进程中，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1985-1991）。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的民主转型、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崩溃（1989），均有体制内改革派与思想者的作用。

这表明，极权体制的掘墓人往往来自体制内部。原因在于：一是体制内思想者更熟悉制度运作与权力结构，拥有揭示真相与行动的条件；二是他们在长期矛盾中积累了思想异化，对自由与民主的需求更为迫切；三是当体制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衰退时，体制内的背离行为将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

因此，中共体制内人放弃体制，不仅是个体的选择，更可能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

四、中共体制内的权力与身份结构

要理解体制内人的处境，必须分析其内部的分层结构。一是权贵阶层：这是人数极少但掌控庞大财富与资源的群体。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权力已被约一百多个家族牢牢控制，他们在经济、政治与军队中具有绝对话语权（沈大伟，2015）。这一群体与体制深度绑定，他们的利益与体制存亡紧密相连。二是庞大的从属群体：包括各级官僚、干部、事业单位人员、军警系统人员。他们是体制的日常运转者，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抛弃的“耗材”。党内运动、纪律检查、政治整肃，使他们随时可能失去地位甚至自由。

这一结构决定了体制的脆弱性。少数权贵的高度依附，与多数从属群体的潜在离心，构成了内在张力。一旦体制衰退，从属群体出于生存考虑选择中立或背离，政权的崩塌就会迅速发生。

五、社会逻辑：从压迫到离散

从社会逻辑看，体制内人的生活状态充满了不稳定性。一是依附性与恐惧：中共体制强调上下级关系的绝对服从，下级必须依赖上级的保护，但上级本身也随时可能被清算。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普遍的不安全感；二是思想的双重性：体制外的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信息与价值观，使体制内人接触到民主、法治、自由等理念。这些理念与现实中的专制体验形成强烈反差。三是被迫的自我异化：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必须口是心非，公开场合高举忠诚旗帜，私下却可能充满不满与怀疑。这种撕裂最终会推动他们在历史节点上选择离散。

正如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所言：“当人们意识到可以过得更好，而制度却阻碍他们时，革命便不可避免”（托克维尔，1856）。

六、政治逻辑：从维护到放弃

极权体制的稳定有两个前提：一是核心利益集团的高度团结；二是下层官僚群体的广泛服从。

当第二个条件不复存在时，政权将迅速丧失运行能力。苏联的解体说明，当体制内多数人不再愿意为体制背书，极权大厦顷刻之间便可坍塌。

对于中共而言，若体制内大多数个体在关键时刻选择放弃体制，哪怕仅仅是消极抵抗、不再维护，它的统治机制也将陷入瘫痪。政治逻辑的铁律在于：统治的合法性不是通过暴力维持的，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服从与合作维持的（韦伯，1922）。一旦这种合作瓦解，独裁的根基就将动摇。

综上所述，中共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部吞噬个体的“绞肉机”；它延续了列宁主义的虚伪合法性；它必然在内部孕育出掘墓人。体制内部的分层结构进一步揭示了多数从属群体与少数权贵之间的张力。从社会逻辑上看，体制内个体长期处于不安全与撕裂状态；从政治逻辑上看，他们的放弃行为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历史转折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中共体制内人更应放弃体制。这不仅是个体的理性选择，更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体现。正如历史多次证明的那样，极权体制的崩塌，往往源于体制内部的瓦解，而非外部的打击。体制内人的背离，既是他们自我拯救的出路，也可能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与民主的重要契机。体制内个体的放弃行为不仅是自我保护的必然选择，更可能成为推动体制瓦解的重要历史力量。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Logic Behind Abandoning the CCP System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deeper social and political logic behind why individual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ystem are compelled to abandon it. The CCP's structure, rooted in Leninist centralism and a one-party monopoly, has evolved into a self-consuming mechanism sustained by fear, ideological conformity, and the systematic destruction of individual conscience. While the regime portrays itself as stable and lawful, its foundations rest on coercion and deception. The so-called "rule of law" and "people's democracy" are nothing more than rhetorical veneers that conceal the Party's absolute supremacy. Within this hierarchy, loyalty is rewarded only temporarily, and even the most obedient officials live under the shadow of potential purges. As history has shown—from Stalin's Great Terror to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the system devours not just its opponents but its own believers.

For countless functionaries, the promise of security within the system has proven illusory. Beneath outward conformity lies a growing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exhaustion. Many realize that their complicity perpetuates an apparatus that undermines the very nation it claims to serve. The CCP's internal stratification—where a handful of elite families control vast wealth and power while lower bureaucrats bear the risks—creates a volatile moral imbalance. The result is widespread alienation: officials maintain the rituals of loyalty in public while privately doubting the regime's legitimacy. Over time, this quiet disillusionment erodes the regime's internal cohesion.

The essay argues that true collapse of totalitarian power rarely comes from outside attack but from within—when those tasked with sustaining the machine lose belief in its purpose. In such systems, obedience is not only demanded but manufactured through fear; once fear weakens, obedience dissolves. As growing numbers of individuals within China's bureaucracy, academia, and military awaken to this truth, their disengagement—whether moral, psychological, or political—becomes a revolutionary act in itself. To abandon the CCP system is therefore not merely an act of dissent, but a reclamation of dignity and humanit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is awakening of conscience among insiders may one day serve as the decisive catalyst for China's transformation toward freedom, rule of law, and genuine democrac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张雪峰“攻台捐款”言论到全网“禁关” 背后的政治原因与机制分析

作者：张致君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校对：林小龙

2025年9月以来，知名教育指导网红张雪峰在“九三阅兵”相关言论中称若发生“解放军攻打台湾”时他将捐款数千万人民币，相关言论在社交平台迅速发酵并引发争议，随后其多个主账号被“禁止关注”或被各平台标注违规并短暂封禁，官方舆论将其长期以来“教育指导极端功利化”与此次言论联系起来予以批评。本张雪峰事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否是中共官方对“战争话语”的管控边界、中央与地方媒体的信号传递存在何种机制、中共政权对社会动员与节奏的把控如何、以及商业化网红在国家意识形态与市场竞争中的脆弱位置都是张雪峰事件中我们作为中台关系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纪念“九三阅兵”或相关大型阅兵讨论的语境中，张雪峰发表视频或直播言论，称若发生对台军事行动，他个人“至少捐款5000万，公司可捐1亿”的激烈表述，该言论在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迅速传播并引起媒体与公众关注；随后河南省官媒等对其言论发表批评性评论并引发更广泛讨论。几周内，张雪峰旗下多个平台账号出现“禁止关注”或被标注“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并有官方或半官方媒体将其既往在教育领域的“功利化”导向与此次言论联系，认为其具有误导性或有损社会秩序。

要理解为何一个以教育咨询起家的网红会因煽动式战争言论而被“封关”，需从三条互相交织的政治逻辑出发：即国家对战争与对外行动叙事的节奏控制；对公共话语边界与“非官方动员话语”的排查；政治与商业化网红之间的利益与权力不对称。

对于台海战争话语的节奏，国家要控制“何时说、谁来说”。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中，关于使用武力、对外军事行动的议题并非普通社会话题，它涉及外交策略、军事部署、国际法后果、以及国际舆论的节奏管理。官方通常需要在信息发布与行动之间保持严格的节奏控制与战略时机，任何在官方未授权的情况下出现“倒计时”式或过于激进的言论，可能造成三类风险从而干涉中共下一步政治行为：对外交与军事部署的“过早暴露”或误导外界判断，影响外交斡旋空间与行动灵活性；造成内部社会情绪的非理性提升或群体极端化；在国际与两岸舆论中形成复杂信号，引发不可控的危机升级或被中共内部的政治对手利用。

基于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官媒对张雪峰言论迅速作出批评并在某些渠道删除相关批评，反映出中共官方在

中台关系敏感议题上的高度敏感与快速反应机制。

中共通常允许并鼓励符合官方叙事、稳定社会的正面言论（例如宣传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等），但从目前中台关系来看，中共对“非官方的动员台海战争话语”持谨慎态度。张雪峰的言论具备“自发动员”和“募款暗示”的双重风险：一方面他以个人与公司名义宣称将为军事行动捐巨款，这实际上暗含着鼓动公众将战争视为某种消费或表演性的捐赠事件；另一方面，流量驱动的网红言论容易将极端情绪放大，形成社会情绪的自发蔓延。中共官方在整治“极端对立情绪”时，会将此类言论视作需要清理的对象。多家评论指出其言论可能“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宣扬恐慌焦虑”，并将其与长期的“教育功利化”倾向并列批评，借此在道德与专业两层面削弱其公共话语的合法性。

观察本事件相关报道可以看到，张雪峰事件一方面出现了地方官媒（如河南大象新闻）对张雪峰公开点名批评的情况；另一方面有些媒体随后删除批评文章或调整措辞。此类现象反映出中央和地方媒体在敏感议题上的复杂互动：地方媒体有时会试图通过点名“顶流人物”来表现“维护社会秩序”的姿态，但一旦中央层面对该议题有更细腻或不同的节奏考量，地方媒体会被要求收回或软化表态。换言之，媒体既是信号发射器，也是信号接收器，地方官媒的迅速点名与随后处理，说明了在敏感外交军事议题上，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即时的协调与纠偏机制。多家报道记录了官媒点名与删除的过程，更加显示这一点。

张雪峰作为“教育顶流”，依靠流量变现、付费课程与咨询等商业模式快速积累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不等同于政治保护。事实上，在权力体制面前，网红的流量既是资产也是风险：一旦言论被定性为“扰乱社会秩序”或“有不当导向”，平台、广告主与监管机关可以迅速切断其变现通道并限制传播。报道显示，张雪峰的多个账号被禁止关注，平台以“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为由采取行动，更加反映出平台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协同机制。对网红而言，参与政治色彩强烈的话题，尤其是在政府尚未统一节奏或表态前，极易将自己置于被动位置。而政府此前的社会性试探，对中台敏感话题的试探，只能从中共指定口岸输出，张雪峰事件恰是印证了这点。

中共官方控制媒体在批评张雪峰时，不仅针对其

“鼓吹战争”的言论，也把其长期的教育主张列为批评对象，称其“教育指导极端功利化，可能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这种将即时政治问题与长期社会影响并置的做法，有两重政治功能：从价值层面削弱其社会信誉：把争议话语同其长期的“错误导向”捆绑，使其既在政治上失据，也在专业信誉上受挫；从制度正当性层面强调“公共教育应服务国家战略”：以“国家发展的人才根基”为理由，强调教育话语应与国家发展目标一致，从而扩大对教育领域话语的政治监管范围。

这种策略既是舆论驳斥的手段，也是扩大监管合法性的政治技术。多篇官方评论与省级媒体的批评，正是以“教育功利化”为切入点进行的道德化指控。

张雪峰事件并非个例，包括近期被封禁的户晨风，在中共治理逻辑下，权力—话语—市场三角关系为维系政权稳定和为政治服务更加明显。

权利方面，中台关系和台海战争部署属于高度敏感话题，国家对敏感议题有高度节奏化掌控权。中共政府对战争、主权等重大问题保持信息发布的节奏与话语主导，任何非官方的言论都可能被迅速遏制。

话语权上，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治理已成为延伸的政治治理工具，社交平台在监管敏感信息、限制账号功能方面具备可操作性，并在国家与平台间形成事实上的协同治理网络（例如通过“社区公约”“违反法律法规”标签实现快速处置）。

而有市场资源的商业化意见领袖在政治领域十分脆弱。流量与影响力虽然能在短期内带来利益，但在政治敏感点上，流量并不保证安全，反而放大了被监管的风险。通过道德化批评也成为扩大治理正当性的常用策略，中共在处理“网红”问题上把个体问题与“国家长期利益”等高价值命题绑定，能够更容易争取公众支持并拓宽治理边界。

张雪峰事件表面看是一起因“激烈言论”而被处置的舆论事件，深层则反映出在中共政治生态中：中共对敏感议题的话语节奏有高度掌控，地方与中央媒体在言论管控上存在即时的校准机制；商业化网红在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红线面前极为脆弱；官方通过道德化与专业化的批评话语来扩充治理正当性。

张雪峰事件提示我们，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领域，言论的自由与市场的私利容易发生冲突，而对这些冲突的处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政府、平台与媒体在此事件中的协同治理轨迹，以及对“教育导向”“战争话语”双重维度的政治敏感，是导致张雪峰快速被封禁的政治选择结果。

在中共，能说什么话，是要政府批准的。哪怕有些政治风向是中共提前释放出来试探社会反应的，作为普通民众连跟从的资格都没有。

“妄议”政治在中共政权下，是一道高压线。

From Zhang Xuefeng's "Donation for Attacking Taiwan" to His Platform Bans: Political Logic and Mechanisms Behind Speech Control in China

The 2025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Chinese influencer Zhang Xuefeng, who declared that he would donate tens of millions of yuan i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tacked Taiwan, highligh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intricate control over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boundaries of public mobilization. Within days, Zhang's remarks spread rapidly across Chinese social media, prompting criticism from both local and national media before his accounts were restricted or banne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olitical logic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ncident, focusing on three interlinked dimensions: the CCP's strict tempo management of war-related narratives, the signaling and correction system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media, and the fragile position of commercial influencers in a politicize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unofficial or premature “mobilizing” rhetoric—especially on cross-strait or military topics—is regarded by the Party as a potential threat to diplomatic strategy, domestic stability, and information discipline. Zhang's self-styled patriotic donation pledge was seen as crossing that line, turning patriotic enthusiasm into a disruptive force outside the Party's control. The rapid criticism and subsequent withdrawal of related commentaries reveal how China's media system functions as both a signal transmitter and a responsive adjustment tool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propaganda management.

Moreover, official discourse linking Zhang's “utilitarian education philosophy” to his political misjudgment demonstrates how the state extends ideological regulation from immediate political control to the moral and professional domains, thereby reinforcing its legitimacy. Ultimately, the Zhang Xuefeng affair exemplifies how China's governance of speech merges political authority, media coordination, and platform governance into a single mechanism of control—where even patriotic expressions must conform to the Party's sanctioned timing and tone to remain permissibl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如果你学了哲学将来吃不饱饭怎么办

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必将倾覆

作者：张宇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韩瑞媛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独裁者背后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有约束的意志，一股集中的和指导明确的力量。而敌手方面，则尽可能无计划地从一切圈子和阶级吸收人员。在另一方面，在对政权不满的人中间，有卓越的爱国志士，他们被暴发户当权者激怒。那些暴发户立足不久之后，竟然能够把最舒服和最能挣钱的位置弄到手。这样，反对派虽然在数量上较多（由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分子所组成），但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未能集结力量去追求一个理想，他们徒劳地抱怨，永远只是势能而不能变为动能。这是一群暴民，却要对抗一支部队；这是无组织的、心怀不满的乌合之众，却要对抗有组织的恐怖，所以无法取得进展。他们从来没有有力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使独裁者得以对他们各个击破。

——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从小就接受要“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教育。然而，随着我的成长和经历，我逐渐发现，社会的现实和共产党宣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让我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信任。

一、言论的不自由

自中国开展“清朗行动”以来，对网络言论管控逐渐升级，今年9月，已有多位知名主播账号在各大平台被突然消失。先是网红博主蓝战非、张雪峰被封禁消息传出，9月30日，网红“卢晨风”在全网账号被永久注销或清空，这标志其彻底退出了国内社交平台。

在卢晨风的一个视频中，他在街头看见一个老人，与老人交谈之后，知道老人每月仅仅只靠107元人民币，所谓的政府养老金生活。这段视频很快在网络上走红，登上热搜后迅速被删除。卢晨风的账号首次遭到封禁，他一共有5次被封禁记录，其中2次为短暂封禁。今年自9月以来，卢晨风已经历三次被封禁。

卢晨风2024年4月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在直播中有观众突然问了他一个敏感问题：“习近平他是一个独裁者吗？”卢晨风当时被吓坏了并激烈地指责对方，他大声说，“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这种人疯了吧？”“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但最终卢晨风的账号还是被封。卢晨风是属于比较大胆的中国人，但是即便如此。当他听到有关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问题的时候，仍然惊恐万分。这种对红色独裁的恐惧深深地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更恐怖是：战战兢兢的卢晨风当时因这个直播节目被封杀，现在又被红色恐惧的暴风扫出了中国国内社交平台。

二、信仰与人权被打压

目前中国官方承认的5大宗教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都有一个隶属于政



府的协会，并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进行“指导和监督”，其中包括外国人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

为表达“独立自主”的国家精神，中国政府自1950年起即将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分离，由政府指定的“爱国教会”管理，凡是不在“爱国教会”管理下的宗教活动都被指非法，受到镇压和迫害，这些教会被称为“地下教会”。此外，中国也为基督教成立了“三自教会”，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原则，企图使中国的基督教走上自主自办的道路，但仍有许多基督教徒不愿接受“三自教会”管辖，选择在未经登记的家庭住所从事基督教宗教活动，这些教会被称为“家庭教会”。凡是未登记的宗教团体成员均不断遭受到政府当局的各种不同程度迫害，包括恐吓、骚扰和拘留，特别是被其定位为「邪教」的法轮功组织。

在坚持无神论的前提之下，中国政府打压迫害宗教的方式通常是把教会组织定性为外国阴谋渗透组织，强力取缔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各种教会组织，动辄将神职人员拘押或下放劳改，并强迫教徒加入政府所操控的“爱国教会”，2004年9月蔡卓华因领导6个“家庭教会”并出版宗教杂志被秘密逮捕，公安部即将这起案件定义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境外宗教渗透案。

在人权方面，有媒体和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利用再教育营的名目，大规模且非正当的扣押数以百万计的本国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少量的基督徒和外国公民（尤其哈萨克斯坦公民）。再教育营内部条件恶劣，部分被关人员时常经历被“虐待”、“洗脑”、强迫劳动等，甚至死亡。还有媒体报道再教育营中存在语言及文化清洗、强

制分离孩童父母和强制绝育等行为，亦有学者、媒体、国际组织及政客将新疆再教育营与文化大革命比较，称其为“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赴中国调查新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新疆人权报告》亦指出中国官方可能已犯下危害人类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中国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声音并存，而不是用高压的方式去打压、恐吓。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但在中国，这个权利已全然丧失。

三、权力缺乏监督

一个缺乏权力制衡，没有独立媒体的反腐，就一定是选择性的反腐。这里的道理很浅显。经济学归纳个人的一般行为方式是自利。商人和政治家更是如此，不然他们就没有兴趣在商场或官场上为钱为权为名博弈。因为执政者是自利的，他反腐的对象只会是侵犯他的利益或者和他利益无关的贪官，而不是他自己或者和自己名誉利益攸关的贪官。古今中外都如此。

习近平反腐目的是保住红色江山世代接班。如此可以解读当今中国反腐中的选择性。一，若要葬送红色江山的如批评现政权的民间反腐，是不允许的。二，刑不上红二代太子党。照理太子党权力更大因此腐败也更严重，但除了薄熙来因为要搞非组织活动企图抢班夺权之外，其他人安然无事。

任何权力如果缺乏制衡，最终都会腐败。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但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很多决策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普通人往往成了代价的承担者，却没有发声的机会。

我逐渐明白，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热爱祖国，并不等于必须拥护共产党。真正的爱国，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民能有尊严、有自由，能生活在一个开放、公正的环境里。共产党剥夺了人民这些基本的权利，那么反思和质疑它，就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真正的关切。

正因如此，我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信任。我相信，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应该有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应该让人们有选择的自由，说话的自由与尊严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The Inevitability of Collapse Under Dictatorship: A Reflection on Freedom, Fai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essay begins with Stefan Zweig's insight that dictatorships, sustained by concentrated power and fear, ultimately sow the seeds of their own collapse. Draw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author—writing as an ordinary Chinese citizen—reflects on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ideals promo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the lived reality within the country. The paper identifies three major dimensions of this crisis: the suppression of free expression, the persecution of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absence of institutional checks on political power.

First, the restriction of speech has intensified through state-led campaigns such as "Clean Cyberspace," where public figures and influencers have been silenced for content deemed politically sensitive. These actions reveal the extent to which fear has become internalized among citizens, producing a culture of self-censorship. Second, the essay examines the subordination of faith to state control, as officially recognized religions are placed under government-supervised associations, while independent or "house" churches face harassment, detention, and criminalization. The suppression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particularly in regions such as Xinjiang, is interpreted as a profound violation of human dignity and basic human rights.

Third,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CP'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lacking transparency and independent oversight, amount to selective justice—targeting political rivals while shielding the privileged elite.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without accountability has eroded public trust and moral legitimac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patriotism should not be conflated with loyalty to a ruling party. True love of country arises from the hope that its people may live with freedom, dignity, and fairness. The essay ultimately asserts that a society without freedom of speech, belief, or supervision of power cannot sustain justice or progress, and that systems built on fear and coercion inevitably face moral and structural collaps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的关系

——兼论其在专制体制后的平权效应

作者：劳绍海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今年10月11日，中国民主党在洛杉矶举行了《同庆中秋，共话民主》的聚会活动，聚会上除了中秋联谊和民运运动讲述外，重点讨论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是息息相关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对社会资源、生存尊严的冲突纷争机制，更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精神与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共同体中以理性、平等、程序化的方式处理分歧。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投票本身，而在于“如何讨论、如何做决定、如何服从多数而不压迫少数”。在这一点上，美国军事工程师亨利·罗伯特（Henry Robert）在十九世纪中叶所编纂的《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可谓为民主的日常运作提供了一个精密的“程序框架”。

这一规则体系在议会、公司理事会、非营利组织、教会、党团、军队、学生社团甚至社交游戏中被广泛采用。它规定了会议的召开程序、发言顺序、动议与修正、表决与记录的方式。表面上，它只是“会议管理”的手册；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体现了民主精神中最核心的一点：通过制度化程序来约束权力，保障平等表达，并以透明的方式达成集体决策。

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分析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内在关联；其次，探讨当这种规则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尤其是共产独裁体系的基层组织时，如何反而促进了一种“程序化的权利保护”；最后，以“被斗争失败一方的权贵家族”为例，说明即便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程序化的民主机制仍可能成为社会稳定与公平的隐性支柱，从而慢慢完成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

一、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民主精神

1. 平等与程序的结合

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中，“平等”是价值目标，“程序”是实现路径。罗伯特议事规则要求每一位成员，无论其地位高低，均有权提出议案、质询、发言与表决。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是防止权力垄断的制度保障。例如，在议事过程中，“动议”（motion）必须得到“附议”（second）后方可进入讨论阶段。这一设计防止了任何个人垄断议题。发言顺序通常由主持人依次点名，且要求反对与支持双方轮流发言。即使是少数派，也有机会表达异议并被正式记录在案。这正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生动体现。

2. 冲突的制度化



民主并非消除冲突，而是把冲突转化为制度化的讨论。罗伯特议事规则把情绪化的政治对立，转化为可管理的“程序竞争”。发言需针对议题，修正案必须明确具体，投票必须公开或依规定方式进行。这使得政治过程不再依赖领袖的个人威望，而依赖于程序的正当性。这种机制的意义在于：即便结果不公，过程仍可信，以后仍可通过词机制来解决冲突。正如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所说：“民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决策结果，而在于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机会，即程序正义。”

3. 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互补性

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独立于民主制度存在，它是民主制度的“操作系统”。民主宪政提供了权力结构，议事规则则提供了权力运行的细节逻辑。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学校董事会乃至军队委员会中，罗伯特议事规则让民主不流于口号，而成为可执行的行动方案。它让少数派的声音在被否决时仍被尊重，让多数派的决策在被执行时仍具合法性。换言之，它不是民主的象征，而是民主的机制。

二、专制体制下的意外效应：程序的自我扩散

有趣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只能在民主国家中运作。当它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内部，尤其是高度集中的共产党政权体系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程序性张力”——它在表面服从权威的同时，也在内部重塑权力关系。

1. 从集中到分权的细微过渡

共产党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表面上，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少数服从多数”相似，但实质不同——前者是权力指令，后者是程序共识。天壤之别的是：人是

利益的动物，专制独裁者不可能是程序正义的化身。然而，在许多共产党国家的地方基层组织（如工会、职代会、村民自治组织）中，随着会议管理规范化，某些“罗伯特式”的程序被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谁可发言、如何提出议案、如何投票、如何记录决议。结果，这些看似无害的程序，反而为基层成员提供了一个有限但真实的表达空间。这种程序化表达使“权力命令”不再是单向的，而带有某种合法性约束。例如，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民选举与职工代表大会中，“举手表决”与“会议记录”的规范化，让原本不被信任的投票过程获得了部分公信力。

2. 权利的“副产品”

程序化的民主机制，即使在独裁体制下，也会生成意想不到的权利副产品。因为一旦会议过程被固定、记录、归档，个人行为便可追溯；而追溯意味着问责。在苏联后期与中国改革初期，党内会议开始使用更系统的议事程序、会议纪要、投票统计。这些举措在本意上是为了提升“组织效率”，却客观上让下级有了某种“制度庇护”——任何命令都需有程序依据，任何处分都需有会议记录。这种形式的“程序防火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断决策带来的任意伤害。

三、斗争失败者的意外保障

在极权体制下，“阶级斗争”常常意味着绝对的政治清算。历史上，被斗争的一方往往失去一切：财产、身份、发言权乃至生命。然而，当罗伯特议事规则式的程序逻辑渗透进体制运作后，即便是“失败者”，也开始获得某种象征性乃至实质性的保障。

1. 程序作为冷静的中介

斗争中最残酷的时刻，往往是激情压倒理性、群体压倒个人。当决策被迫经过会议程序、需要表决和记录时，程序成为理性的缓冲器。它迫使参与者停下来思考：“是否有正当理由？”、“是否应让对方陈述意见？”即使最终结论仍然不公，程序过程本身也在降低暴力的烈度。正因为此，部分共产党国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式的混乱后，开始重新强调“会议纪律”“发言秩序”“表决程序”，这正是社会对“程序文明”的重新追求。

2. 权贵家族的“程序庇护”

或许很多人痛恨专制体系中既得利益者，但是专制内也是有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理性的，甚至可以功利地看待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即便是曾经的权贵家族，也可能通过程序正义获得部分尊严的回归。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平反”过程为例，许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家属，之所以能获得平反与补偿，正是因为当年的会议记录、处分决议、档案程序被保留——这些文书成为程序正义的证据。换言之，程序留下了历史的凭证，也给了失败者复原的可能性。如果专制既得利益者对平民有犯罪则追责其犯罪事实，但是他如果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失败者依然应能得到适当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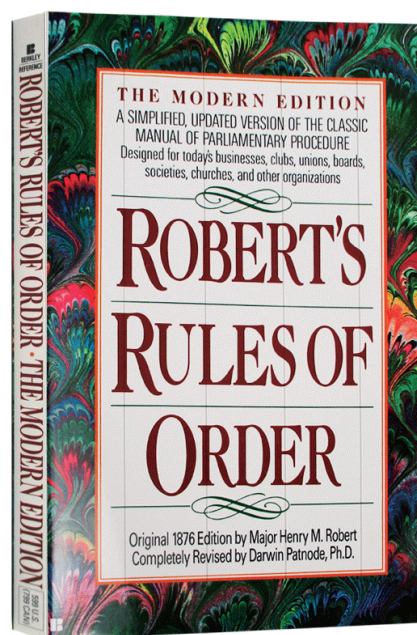
护，与其犯罪事实独立处理。如果他没有犯罪，政治斗争失败者更需要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可以体现民主体制的可贵，才会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如果民主体制的支持者量变到一定程度，将会引发质变，即向民主社会转型。

这正体现出罗伯特议事规则精神的深层力量：即便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制度化的程序正义仍然是权利最后的避难所。

结语、民主的普适逻辑：从规则到文化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能组织会议，更因为它把“民主”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文化习惯。当人们习惯于等待发言顺序、习惯于以表决定夺、习惯于记录与归档，他们就不再是权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制度的参与者。在这种文化内化之后，即使权力仍然集中，权力行使者也必须顾及程序的形式；而形式的约束，终将孕育出实质的约束，只要社会发展的时机成熟，很有可能会转型孕育出一个初级的民主社会。正如法律学者所言：“程序的形式化，往往是自由的开端。”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意义，远超会议管理。它代表的是一种“以规则约束权力、以程序平衡利益”的现代政治智慧，它是民主的种子与制度的延展。在民主社会，它是公民参与的操作指南；在专制社会，它是秩序中孕育公正的裂缝。当一个体制——即便是共产独裁体制——开始在内部采用程序化的决策方式，社会的政治文化便悄然发生变化：权力不再全是意志的体现，而是程序的结果；决策不再只是斗争的胜利，而是规则下的妥协。而这种变化，正是民主的真正萌芽。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拒绝成为中共教育孕育的恶婴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林小龙

中国70、8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很熟悉葫芦娃的故事。应该记得故事里有一个金葫芦娃，和其他兄弟不同，他不是山上长大的，而是由妖精带回魔窟，亲手用邪恶养育的，因此一出生就带着邪恶力量。这像极了我们这代人，童年与青春期被中国共产党体制欺骗和毒害。我们本该像藤上的葫芦一样，自然成长，拥有独立的思想与纯真的心灵。然而，我们的成长却被牢牢控制在另一只无形的手里——国家与党的教育体系。从识字的第一天起，我们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背诵的是被删改的历史，学习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标准答案”。在这种环境里，孩子们被刻意隔绝在真实之外，慢慢被塑造成忠诚的接班奴隶，而不是独立的人。以下事实都是我亲身所经历的荒谬事实。

一、中国式政治洗脑教育：把孩子养成驯顺的奴仆

从小就在潜移默化中变成沉默，服从的顺民。我入学的第一天，被教导就是服从，双手放在桌上，一动不动，不说话就得到表扬。而调皮反抗就会受到惩罚。但当时的父母心中，老师地位很高。父母因为文革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非常重视教育，他们总是叮嘱我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否则将来会一无是处。儿童的活泼好动的天性就这样被扼杀。我所在的中学会强迫学生剪短发，穿没有设计感劣质的校服，遏制爱美天性和个性。我知道的只有监狱和精神病院才需要剃头发穿制服。有一个男生头发长超过了一寸一点点，竟然被主任强行剃头羞辱。反抗就会受到处分。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被教导要“热爱祖国”，对党感恩。就像那首歌唱的是党带领中国人推翻了旧体制，打跑了侵略者，流血牺牲，建立了新中国，给了我们一切。我在小学时，因政治要求学校组织我们强制看了十多场的黑白爱国教育电影《闪闪红星》《游击队》《邱少云》等等，作为政治学习的一部分。现在想来抗日影视片段的夸张暴力与仇恨表达，其实是不利于小学生的身心成长的。中学时，也有一段唱红歌的热潮。老师为了获奖，全班同学把《黄河大合唱》唱到吐。

背诵的是被删改的历史。我从小在课堂里背诵“抗日战争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标准答案，背诵“新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壮语。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全部的真相。直到有一天，加入了国民党的远房亲戚回国，和我聊起那个战争年代。我在YouTube查看到



了一些海外资料，才发现原来还有被掩盖的历史：国民党军队才是正面战场的主力，数千万平民在饥荒和政治运动中死去，六四惨案更是从未出现在任何教材里。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我从小到大背诵的，不过是被删改过的历史，是统治者精心编织的谎言。真正的历史从未消失，只是被隐藏，而我们却被迫在虚假的记忆中长大。

学习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标准答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下一代，被教育成了夜郎自大的样子，盲目的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周围很多孩子母亲都不止一次的谈论起现在越来越加强的洗脑教育。领袖崇拜、党史歪曲、仇外叙事全面强化。2017年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强制写入小学、初中、高中教材，要求学生背诵。而文革，大跃进已经从历史课本中删去。曾经我们学习的古汉语诗词发音，现在也是只有老师才是唯一答案。家长和学生都无法和老师所代表的权威提出质疑。

强调国学，弱化英语教育：近十年，我听到越来越多的词叫“国学”。其实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国学班”“弟子规诵读”“国学夏令营”培训和商业活动。表面是“文化自信”，本质是切断年轻人接触外部世界的通道，让他们更多停留在官方编排的文化叙事里，填补精神空白。这与封锁互联网、限制海外信息渠道，是一脉相承的操作。

近五年英语课比例的调整、去英语化的试点、教材标准中外语比例保存或下调的规定，使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英语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和学知识的工具。我真不敢想象将来学生还有什么可以去依仗、去了解世界的进

步和中国发生着的这一切邪恶罪行？另一个讽刺的是中国权贵的孩子却无例外的选择了留美、英、奥求学。

二、努力营造的厉害国的神话和全民自嗨

首先，基础教育里反复洗脑的是中国地大物博，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关于地大物博号称煤炭储量丰富，但大量资源被国企垄断，环境污染严重，老百姓并未因此受益。稀土储量丰富，精炼带来的环境污染也同样伤害的是老百姓。有耕地和粮食，却常常要靠进口大豆、玉米来维持供应。中国历史“最悠久”只是宣传口号，放到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上，中国只是众多古文明之一。看看埃及的展览就可以发现古埃及文明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3100 年，比中国夏朝早一千多年。苏美尔文明更早，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与城市。

其次通过各种媒介制造强国假象。从80年代开始，中共极其重视奥运会金牌，努力提升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奥运冠军被当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在利益加持下使用兴奋剂已经成为中国运动员的常用手段。殊不知奥林匹克在国外最多就是个人成就。重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承办，不惜重金打造会场，奖励运动员，大肆宣传。人民未必享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通过拍摄大量自嗨的类似战狼的影片，塑造的中国特种兵几乎是“超人”战无不胜。战狼影片宣传的不是现实，而是一种“幻象”：中国无比强大，敌人不堪一击，把爱国等同于盲目崇拜，把国家和政党混为一谈。现实中，中国军队缺乏实战经验，真正的国际军事行动远不如影片所展示的那样。观众被动接受这种情绪灌输，很容易陷入虚假的民族自豪感，而忽视现实中的问题：腐败、经济下滑、社会不公。

中国在非洲的现实影响力，主要靠资金+工程+资源换取政治支持。中共的“援助”不是平等合作，而是一种新的掠夺与控制。我们自豪的遥遥领先的民族之光公司，不过是靠抄袭、技术窃取、政府庇佑发展起来的假象。当制裁来临，芯片遭美国禁运，中国的“科技巨头”立刻显出脆弱。所谓“卡脖子”问题，本质就是几十年没有真正掌握原创技术。

当我具备了学习能力和了解了世界后，回看这一切。才清楚意识到这些都是教育的洗脑手段。一开始对于盲目的夜郎自大的爱国宣传，我是十分反感的。但是，我在国内无处表达。因为周围的造谣的人永远比辟谣的人多，盲目信任的人永远比相信真相和科学的人多。要知道中共造谣是职业的，甚至还雇用了大量的职业写手，文人，科学家，文艺工作者都一起来造谣。而说真话，辟谣的声音力量太小，从此我也不再愿意讲出来。根本没有人听。

三、宣扬仇恨，转移矛盾

我读书时美国被描绘成“霸权主义国家”，日本永远是“军国主义的潜在威胁”，韩国则常被贬为“棒子国”。国外都是流浪汉，非法枪支。在美华人生活在恐惧之



中。而日本则是充满了辐射污染，连日本刺身也不可以吃了。同时，各类抗日神剧，把日本人塑造成愚蠢、残暴的小丑；官方媒体宣传经常用“欧美帝国主义”“西方敌对势力”来解释社会问题。新闻联播里最不和谐的声音永远都是我们和这些国家的敌对。抹黑的真实目的有三：制造敌人：没有外部“强敌”，中共的合法性就会动摇；转移矛盾：经济、社会、腐败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外国打压”；强化控制：让人民相信外部世界充满敌意，从而更依赖中共“保护”。

四、利用欺骗手段掩盖信息，新闻早已没有自由

记忆中第一次接触到政治运动是1989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和父亲一起关注新闻里六四学潮报道。堂哥当时在读大学，尽管他的母亲打来长途电话，再三劝说他不要去游行，可能会留下污点。但他还去了。当时堂哥的行为让我觉得那时的大学生和后来不同，他们心怀天下，愿意为了民主和自由呐喊，敢于承担历史使命而不顾个人安危。我不明白他们做错了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件很快就被演变成了恶人乘机而入的暴动。这个事件便是中国欺骗手段的铁证。当时作为远离北京的民众，听到的消息都是从新闻报道来。学生的非暴力运动被污蔑成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从中挑拨学生和武警导致事态不可控制。请大家留意，这是共党最常用的下作手段，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接下来就是第一个手段血腥镇压。20万武装军人面对几万学生。死伤至今无法统计。而中共报道里却只有武警被学生杀害的离谱事实。最后的手段就是惩罚和掩盖。这次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潮最终被武力干预而偃旗息鼓，很多学生被通缉，而当时我信任并敬佩的堂哥也因为参与那个事件，受到了三年不能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惩处。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也因为这个事件中支持学生的抗议导致个人前途灰暗。六四事件第一次让我感到了阴霾，学生的非暴力正义的举动、却要以个人未来发展受阻甚至以血为代价。随后这段历史仿佛没有发生过，消失在了中国历史中，消失在中国任何媒体里。

五、高筑信息茧房，防止人民知道真相

2000年正是互联网发展的年代，作为大学生的我天天都兴奋的在网上冲浪，我很喜欢的《v字仇杀队》和《黑客帝国》，还有《肖生克的救赎》这些电影让我有



了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He crawled through a river of shit and came out clean on the other side.” 当时我很喜欢这句话。现在我更明白其中的深意“他爬过污秽肮脏，却在另一端获得了自由。” 他告诉我没有人应该忍受集权和统治，更没有人应该被奴役。但是很快我们这些自由也被剥夺，从 2002 年 Google 开始试封，到 2009 年大规模封锁 Facebook、Twitter、YouTube，再到 2014–2020 年几乎所有美国主流网站被全面屏蔽。中共利用信息墙把国人和外面的世界隔绝。由于防火长城（GFW）屏蔽外部信息，民众只能看到中共批准的新闻报道，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信息茧房”。这时候只有一个声音，就任由中共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

我再一次感到了文革般的窒息在向我靠近。我在互联网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翻墙的工具，法轮功的浏览器帮我跨越了这个精神的墙。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真相。但很多国人，却习惯了墙内生活也不去看外面世界了。人都有惰性，我担心再过几代，翻墙的人会越来越少。

中共教育下的“恶婴”，在谎言中长大、在仇恨中被塑造、在恐惧中被驯化。他们的身体长大了，但精神却被困在婴儿般的依附和盲目中。生来带着邪恶的烙印，被用作统治的工具。

谎言可以制造一时的顺从，却永远无法扼杀追求真理的心。每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的人，都是打破铁幕的火种。当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做“恶婴”，这个民族才会真正长大。



Refusing to Become the Monstrous Infant Bred by CCP Education

This essay offers a personal reflection on how a state-controlled education system can shape citizens' thinking from childhood, suppress individuality, and replace independent reasoning with political loyalty. Drawing on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s of growing up under a highly centralized ide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essay argues that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uch systems functions not to cultivate critical minds but to reproduce obedience and conformity.

The analysis begins with early schooling, where discipline, silence, and uniformity are equated with virtue. From patriotic songs to history lessons edited to serve official narratives, children are taught to associate gratitude and moral correctness with unconditional allegiance to authority. The curriculum systematically filters historical memory, eliminating inconvenient truths and rewriting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essay further examines how 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selective knowledge control—such as emphasizing “traditional values” while diminishing exposure to global perspectives—nurture an illusion of national superiority while isolating citizens from external realities. Media, film, and popular culture reinforce this constructed pride, promoting emotional nationalism and external hostility to distract from domestic challenges.

As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becomes increasingly restricted, censorship and digital barriers deepen intellectual isolation. The author likens this process to raising “infants of ideology” —citizens whose physical maturity masks emotional 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naivety. These individuals grow up in fear of questioning authority, mistaking submission for safety.

Ultimately,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ideological control can manufacture temporary stability but cannot extinguish the human desire for truth and freedom. True maturity, the author suggests, begins when individuals reject imposed narratives, seek knowledge beyond official limits, and reclaim their capacity for moral and intellectual autonomy. Only when citizens rediscover independent thought can a society outgrow its engineered dependency and move toward genuine enlightenmen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民营资本为何屡遭打压

——党国资本主义的真相系列二

作者：景辉辰

编辑：韩瑞媛 责任编辑：胡丽莉

摘要：中国民营资本屡遭打压的体制根源在于“权力—资本一体化”的党国资本主义模式下，民营资本的独立性触碰了政权安全红线。周期性的行业整肃并非市场行为，而是权力为吞并资产、消除威胁而进行的政治清算。

在中国当下的体制中，民营资本屡遭打压绝非偶然，而是党国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结果。党政权力与国有资本深度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权力—资本一体化”模式。在这一体制下，民营资本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随时可能被打压、设陷、甚至被清算。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夹缝中生存，最终的结局往往是资产被吞并、自由被剥夺。

一、权力的红线：不容挑战的附庸地位

在党国体制下，民营资本的发展必须以服从权力为前提。表面上，政策鼓励民企发展，但一旦企业规模过大，形成独立影响力，就可能触碰权力红线。

因此，许多打压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和政治手段的体现：突如其来的调查、严苛的监管、巨额罚款，甚至强迫企业家“公开表态”。这样打压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民营企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是必须服从权力的附庸。

2020年，蚂蚁集团即将上市，估值超3000亿美元，原本将创全球最大IPO。但因马云公开批评监管体系，上市在前夕被紧急叫停，随后公司被要求全面整改，马云本人一度消失。此事凸显民企一旦触及权力红线，便难逃政治打压。

二、资本的围猎：国资主导的吞并游戏

中国最核心的金融、能源、土地、通信等领域，几乎全部掌握在国有资本手中。凭借政策与资源优势，党国资本在竞争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

这意味着，即便民营企业有创新和竞争力，也很难长期立足。很多时候，打压并不是终点，而是吞并的前奏。企业在被压低后，要么被迫低价转让股份，要么被剥夺控制权，最终被纳入国有资本的体系。

2018年，民营巨头安邦保险因“严重违法经营”被监管接管，创始人吴小晖被判刑。接管后，其核心资产被国有资本重组，转入大家保险集团，实现了民企向国企的低价吞并，凸显国资对民营资本的主导和围猎。

三、安全的焦虑：打压背后的政治动机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真正的原因并不只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权安全。民营资本一旦形成独立力量，便会带来社会影响力与潜在的独立性，这是党国体制无法容忍的。

因此，周期性的整肃不仅是一种经济管制，更是一种政治宣示。它提醒所有企业家：在这个体制下，资本只能依附权力而存在，否则就会被清算。

2021年，滴滴出行上市后因数据和信息安全问题被监管调查，App被下架整改并罚款。此举凸显民营平台一旦形成独立社会影响力，就可能触碰政权安全红线，向所有企业家传递“资本必须依附权力，否则将被清算”的政治信号。

四、现实的印证：从互联网到房地产

这种逻辑在中国被一次次验证：

互联网平台经济从繁荣到一纸政策下被“一夜清零”。

房地产行业从“支柱产业”沦为“高风险领域”，大批民营房企轰然倒下，数百万从业者顷刻失业。

这些并非市场规律下的自然调整，而是权力出于政治安全 and 经济控制需要所做的直接干预。

五、结语：体制的必然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既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个别政策失误，而是党国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必然逻辑。财富的积累和自由的空间，最终都可能被权力吞噬。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民营资本的困境，揭示了党国资本主义的真实逻辑，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桎梏。



受迫害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成立联盟讨公道

历史视野下的中共独裁

——为什么中国总走不出“独裁怪圈”

作者：赵雪峰

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林小龙 翻译：刘芳

我们回望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循环：反抗暴政、打倒旧主、再出现新的皇帝。从陈胜、吴广的起义开始，我们的政治故事就像陷入了一个永恒的回圈。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带着热血与激情，但最终几乎都走向了新的极权。我们一次次推翻不义的秩序，却始终没能学会——如何限制新的权力。

一、起义有勇气，但没制度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这句呐喊，点燃了平民反抗的火种。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大声说出——我们也不想当家做主。但他们打碎了旧秩序，却没建立起新的规则。此后两千年，历史一再重演：靠愤怒起事，靠暴力夺权，靠个人权威维稳。旧皇帝倒了，新皇帝照旧。百姓换了旗号，却没换命运。

二、朱元璋的“暴力模板”

自秦以后，独裁的模式被制度化了。到了朱元璋，独裁更加变本加厉。他从乞丐变成皇帝，用铁血手段统一天下，却也建立了一个恐惧维系的国家。功臣被杀、官员噤声、百姓沉默。朱元璋确实结束了战乱，但他让整个社会学会了一个危险逻辑——“服从才能换来安全”。

这种逻辑，成了后来几百年专制政治的底色。

三、太平天国：理想变成灾难

太平天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起初看似为民请命。可一旦掌权，就迅速堕入另一种极端：以“天王”名义行独裁，动员靠信仰，统治靠军权。理想越伟大，现实越荒唐。这场运动的结局告诉我们：没有制度的理想，越纯粹就越危险。

四、现代化的歧路：列宁式党国的崛起

进入近代，中国也尝试过现代化——宪政、议会、地方自治。但军队未国家化、财政不透明、司法不独立。结果，仍是谁有枪谁说了算。中共就在这种乱局中崛起，借助列宁式党军体系与意识形态控制社会。革命成功后，他们立刻用“历史使命”取代了“人民授权”，让中国走进了一个“现代外壳包裹下的极权时代”。

五、独裁怪圈为什么打不破？



第一，掌权者怕失去权力、怕被清算，于是只能继续高压维稳；

反对派又不信任制度，只能以非常手段反抗——信任崩塌，循环永续。

第二，社会太弱，国家太强。没有独立的媒体、工会、社团、学术空间，公共讨论的土壤贫瘠。

第三，法治被工具化。法律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维稳。

第四，科技进步反而让监控更高效，独裁的成本越来越低。

六、海外民运的盲点：反共不等于民主

很多人以为，只要“反共”就是民主派。但反共的理由千差万别：仇恨、民族主义、权力欲……都有。

问题在于，民主不是推翻谁，而是建立规则。在一些民运圈中，常见三种误区：一是先定罪、后程序；二是用个人崇拜代替制度建设；三是热闹很多，规则很少。如果反抗只是喊口号、发声明，而不能形成制度化力量，那就只是另一次轮回。

七、走出怪圈的路：制度、社会与文化

中国要想摆脱独裁，不靠圣君，而靠三样东西：

制度上：军队国家化、权力分立、司法独立；

社会上：发展自治社团，让公民能在规则中合作；

文化上：从“英雄崇拜”转向“制度信任”，从“谁好谁坏”转向“是否可监督、可更替”。

民主并不浪漫，它只是让人“可以预期、不再害怕”的生活。

未来或有不同路径——渐进改革、危机重建、或外部规则推动——但无论哪种，都必须防止倒退。

新闻自由、政党竞争、选举透明、任期制度——缺一不可。

只有让权力能上能下、能查能罚，中国才可能真正告别“换皇帝不换系统”的宿命。

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再到太平天国与中共，中国的历史像一场无休止的循环剧。每一代人都热血地在问：“要推翻谁？”却极少有人认真思考：“权力该如何被约束？”

真正的民主，不靠激情革命，而靠冷静的制度建设。

当反抗的怒气化为规则，当人们学会信任程序胜过领袖！

那一刻，中国或许才算真正走上通往自由的路。

CCP Dictatorship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y China Cannot Escape the "Cycle of Despotism"

This essay explores why China has repeatedly fallen into cycles of autocracy throughout its history—from peasant uprisings to imperial dynasties to the modern one-party stat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hile Chinese revolutions have often shown immense courage in toppling tyrants, they have consistently failed to establish institutions capable of limiting new power. From Chen Sheng's rebellion to Zhu Yuanzhang's brutal rule an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s theocratic despotism, each movement replaced one authoritarian system with another.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a's attempt at modernization through constitutionalism and parliamentary reforms failed due to weak institutions and militarized politics, paving the way for the rise of the Leninist party-sta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herited this legacy, combining ideological control with modern surveillance to perfect a "technological autocracy."

The essay identifies four reasons the "dictatorship trap" persists: fear of losing power among elites, the absence of civil society,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law, and technological reinforcement of repression. It also critiques overseas dissidents for equating anti-Communism with democracy, warning that without institutional discipline, revolution merely restarts the cycle.

To break free, China must pursue systemic reform: nationalize the army, ensure separation of powers, protect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nurture civic organizations. Only when power becomes accountable and replaceable can China finally move beyond its historical pattern of "changing emperors without changing the syste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香港，
台灣！？
.....
權威嗎？
.....
擴張，
爭密切相連！
.....
地——包括台灣，
三規軍的背後，
.....

他們不是中國
的軍隊，而是中
共最高領導人
的私人軍隊！

别忘了你的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中共

作者：陆乾坤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程铭 校对：熊辩



一、阅兵场上的幻象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坦克轰鸣、战机呼啸，中共以“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为名举办大规模阅兵。然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却是当今世界最臭名昭著的两个独裁者：因入侵乌克兰遭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普京，以及延续三代世袭、让朝鲜沦为炼狱的金正恩。

这一幕，荒诞至极。所谓“反法西斯胜利纪念”，竟被中共演绎为“当代法西斯的集会”。真正的国际民主力量与抗战盟友永远不可能理睬这个专制小圈子。这不仅暴露了中共在国际外交上的孤立，更彰显了其对历史的盗窃与对现实的无力。

事实上，这并非中共第一次利用阅兵进行政治表演。2015年“九·三”阅兵，便是一次典型的“秀肌肉”场景。正如当年苏联在解体前仍频繁举办红场阅兵，中共同样试图通过耀武扬威掩盖内部危机。

二、苏联的镜像与中共的焦虑

回望历史，苏联在1980年代末已陷入深重困境：经济停滞、物资匮乏、社会矛盾激化。然而在红场上，坦克和导弹依旧列队前行，仿佛强大如昔。结果呢？几年的时间，苏联轰然解体。阅兵所展示的“强大”，只是崩塌前的幻影。

中共的“九·三”阅兵，无论2015还是2025，都是同样逻辑：

掩盖困境：面对房地产崩盘、债务危机、青年失业潮，政权需要一个盛大的舞台来制造繁荣幻觉。

言论封锁：当经济失去支撑，社会不满滋生，只能靠压制声音维持表面稳定。

外部威慑：通过军力展示，恐吓国际社会，让其在援助中国人民时投鼠忌器。

这种政治逻辑，与当年的苏联如出一辙。历史的相似性令人不寒而栗：一个外表强硬的政权，内里早已千疮百孔。

三、盗用历史与法理荒谬

中共宣称自己是“反法西斯胜利的领导者”，但事实是：1945年抗战胜利的功劳属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体中国人民。中共在抗战时期不过是游击队一隅，真正的主力战场是国民政府军的正面抗战。

今天，中共却将中华民国的功勋据为己有，甚至把“反法西斯胜利”包装成自己的胜利日。这是对历史的篡改，是对中华民族记忆的盗窃。更荒诞的是，它邀请普京、金正恩这类当代战争罪犯登上城楼，以“纪念反法西斯”之名，行“法西斯同盟”之实。

这不仅是法理不通，更是对先烈的背叛。

四、“强大中共”的真实意图

“别忘了你的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中共”，这句话，是政权给百姓的恐吓，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警告。

对内：它要告诉中国人民，你们身后有强大的军队，有不可挑战的政权，任何反抗都将无济于事。

对外：它要提醒世界，任何试图援助中国民间社会、推动人权的行动，都必须考虑北京手中握有的导弹与核武库。

对党内：阅兵也是权力秀，最高领导人以“统帅”姿态检阅三军，借此巩固其在党内的绝对地位。

这种“强大”，并非源自人民的自由与创造力，而是源自恐惧、压迫与武力。

五、外交的孤立与小圈子

表面上，中共“九·三”阅兵邀请了20余个国家领导人出席，但这些国家，大多是依赖中国援助的弱国，或是



与北京同病相怜的专制政权。欧美主要国家当然没有任何领导人出席，中共也没这个脸去邀请。亚洲重要邻国保持距离，只派遣了特使和代表。

这恰恰说明，中共在全球体系中已经陷入孤立。它的“强大”更多是虚张声势，它的朋友圈越来越窄，剩下的只是抱团取暖的独裁者小圈子。

六、虚幻的强大与真实的脆弱

阅兵展示的坦克、导弹、战机，看似威风，但掩盖不了社会深层的危机：

经济衰退：房地产泡沫破裂，外资撤离，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社会焦虑：中产阶级财富缩水，普通百姓生活艰难，年轻人选择“躺平”。

民生危机：出生率急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

这种局面，正如当年苏联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却依旧在红场展示导弹。所谓“强大中共”，不过是末日政权的自我安慰。

七、历史的反讽与未来的启示

“九·三”阅兵，本应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日子，却被中共变成了法西斯的狂欢。它既是历史的反讽，也是对未来的警示。

苏联的教训已经证明：军事炫耀不能延长政权寿命，言论封锁不能阻止崩溃，虚幻的“强大”终将化为尘土。中共今天的表演，正是在重演苏联的历史剧。

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导弹与坦克，而是人民的自由、尊严与创造力。当一个政权彻底依赖恐惧维系统治，它已然走在灭亡的道路上。

八、结语

“别忘了你的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中共”，这句话听起来声势骇人，实则是一种恐惧的表白。中共要百姓害怕它，要世界顾忌它，要历史被它篡改。但最终，它无法阻止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也无法阻止世界对真相的认知。阅兵的盛大烟火，只能暂时遮掩天空，却不能改变历史的方向。未来的中国，必将属于那些追求民主、自由与法治的人们，而中共的“强大”，终将被证明只是脆弱的幻象。

Don't Forget—Behind You Stands a "Powerful" CCP

On September 3, 2025, Beijing staged a massive military parade marking the so-called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Anti-Fascist Victory." Tanks thundered and jets roared across Tiananmen Square while two of today's most notorious dictators—Vladimir Putin and Kim Jong Un—stood beside Xi Jinping. The scene exposed a grotesque irony: a regime claiming to honor the fight against fascism hosting a gathering of modern fascis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used the parade, as it did in 2015, to project power amid growing weakness—an echo of the Soviet Union's Red Square parades before its collapse. Beneath the display of missiles lies a nation mired in economic decline, ballooning debt, collapsing real estate, and surging youth unemployment. The spectacle was less about national pride than about masking crisis, silencing dissent, and intimidating both its citizens and the world.

The CCP's appropriation of history is equally hollow. The 1945 victory over Japan belong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not the Communist Party. By rewriting history and inviting war criminals to its stage, Beijing turned remembrance into propaganda. Its "strength" comes not from citizens' freedom or creativity but from fear, censorship, and military coercion.

Diplomatically, China stands isolated. The few attending leaders represented authoritarian or aid-dependent regimes; major democracies declined to appear. The CCP's "circle of friends" now resembles a club of dictators clinging to mutual survival.

Meanwhile, everyday life in China reveals the regime's fragility: shrinking incomes, vanishing jobs, a demographic collapse, and an exhausted public retreating into "lying flat." Like the Soviet Union's empty stores behind its parades, today's China hides decay beneath grandiose imagery.

Ultimately, the slogan "Don't forget there is a strong CCP behind you" exposes not confidence but fear—the fear of a regime that demands obedience, rewrites history, and dreads its people's awakening. True strength is not measured in missiles but in freedom, dignity, and truth.

When the smoke of the next parade fades, history will remember not the fireworks but the silence of those still yearning to speak. The future of China will belong not to the architects of fear but to those who persist in believing that liberty, law, and humanity are stronger than tyrann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上海醒来：我为什么反共

——一个“岁月静好派”女性的自救手记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熊辩



序：体面与谎言之间，总有裂缝会漏风

我曾以为，人生的终极形态叫“独善其身”：学历堂堂，上海白领，周末咖啡，朋友圈九宫格——政治这玩意儿，离我远点。后来才发现，体面是临时工，谎言是正式工；你以为是风平浪静的人生里打卡，其实是在专制的气压里待机。直到风从裂缝里灌进来——裁员、封控、禁言、黑箱——我才明白：所谓“岁月静好”，只是尚未轮到你。

于是，我开始给过去的自己写一份说明书：我为什么反共。

家庭起点：善良的父母，粗暴的时代

我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勤劳诚实，却在文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青春喂了“斗”和“批”。改革以后，他们又遇到下岗潮；父亲自学成了助理工程师，却背着饥荒年代落下的病根，家计常常捉襟见肘。我们家没什么“阶级仇恨教育”，只有“谁错了先道歉”的家规。民主的家庭氛围让我从小就知道：权威可以尊敬，但必须可被质疑。

我也像标准答案里写的那样好学、听话：少先队、共青团，能上的都上。只不过当时不懂，红领巾和团徽并不等于道德与真理，它们只是组织关系。第一次对“正统叙事”生疑，是小学那年看 1989。堂哥去游行，回来背了处分。电视里说“有不法分子搅局”，我却只记得：年轻人的呐喊为什么要以学业和前途为代价？

书本与银幕：独立的种子，被外语浇了水

中学时的政治课像快递：到课即签收，不含思考。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历史只剩一种版本。校规要求“统一短发与劣质校服”，我忽然明白：剃头与制服，常见于监狱与精神病院。

幸运的是，90 年代末到 00 年代初，世界还留了条缝给我。《简·爱》、《傲慢与偏见》、《飘》告诉我，做人的底线是尊严，自由和爱情都靠得住；《V 字仇杀队》、《黑客帝国》、《肖申克的救赎》教我：在系统性谎言面前，逃跑不是懦弱，思考才是冒险。一位室友劝我好好学英语——“真正的知识在墙外”。我没出国，但这门语言成了逃离精神版图的护照。

直到某天起，Facebook、YouTube、Google 被一键消失。空气里出现了一个无形词条：防火长城。我学会“翻墙”，像在黑夜里摸到一只手电筒。光很小，却足以看见房间里并非只有家具，还有锁链。

科研现场：当“真问题”遇上“真 KPI”

我读的是生命科学，从细胞到分子，从观测到机理，逐步看清一个不太体面的事实：中国科研并不缺钱，缺的是把钱用在真问题上的制度。经费评审看人脉，论文数量当绩效，导师忙应酬，学生当螺丝钉。学术理想最后被六个字打包发走：发文章、要指标。

两个事件把我的“科研滤镜”砸得粉碎：

- 基因编辑伦理翻车：某副教授把人类胚胎当试管小白鼠，科学没跑通，伦理先失踪。最后三年牢狱出来还是教授，体制责任人“路过不背锅”。

- 不可复现实验的跃进：一个震惊世界的新工具，几个月后被发现“别人就是做不出来”。楼起得快，塌得更快；追问失效得最快。

科学需要时间、诚实与失败权，而体制提供 KPI、排名与宣传片。当真理被“年度汇报”衔着跑，结果往往不是突破，而是事故。

职场见闻：外企的规矩，内资的魔法

博士后我留在上海。外企的第一课：流程不是摆设，合规不是口号。大家没有加班文化（至少不是 996），发现不内卷也能把事情办好。但并购一来，“中国式管理”像病毒：表格宇宙、权力斗法、劣币驱逐良币。于是我转向“民族产业”，想做点真正造福病人的事，结果经历了两家“人矿工厂”。

公司 A 口号是“无边界”灵活工作，翻译成成人话叫：没有边界的无偿加班。疫情爆发，他们把研发扔进疫区抢样本，“捐赠”只是 PR，合规是可选项，薪资则是闭口不谈。Apple Watch 是我健康的遗书，心率报警像上班考勤。最终产品死在审批门口——游戏一早写好，行业真正赚钱的，是早就在白名单里的既得利益者。赌徒

式老板妄图抄近道，拿员工健康与性命去填坑；监管黑箱，游戏早被写好，外人只配当炮灰。

公司 B 外表“海归范儿”，内核“圈钱学”。目标不是产品上市，而是公司上市。同行之间靠诋毁竞速，内部靠 KPI 自残。抄作业被称作“国产替代”，击鼓传花被包装成“资本故事”。离开不到一年，公司已被资本放弃停工停产。为什么两个老板都如出一辙的急功近利呢？因为他们身后都是中国急躁的资本和体制，他们被推着一起跑——“快上、快融、快退”，不然就被环境吞了。因为，资本也不确定什么时候政策就变化了，他们手里的钱就没了，还是变现走人比较安全。50年的企业简直说笑，能撑过5年的私企就不错了。

逃回外企，才发现净土也不净。面对体制内客户，“科学常需向行政鞠躬”。你说“请按法规操作”，对方说“领导要今天出报告”；你说“样本污染要稀释”，对方说“我们没时间”。我一点点明白——不是我不适应，是我不同谋。

疫情三年：谣言当口罩，封控当药方

新冠像一面照妖镜。先是甩锅输出“病毒美国造”；再是管控样本、封死信息；公民记者失踪，良心医生被训诫。城市焊门、患者寻医无门，生命像验证码一样失效。我被关家里七十多天，靠团购和运气存活；家人确诊、离世，火葬场的队伍成了我理解国家能力的曲线图。

年末的突然“放开”，让我对“防疫成绩单”的评价只剩一句：数据会说话，只是不能说真话。我由此做了一个长期主义的选择：离开。

出走之后：比较学，最有说服力

美国带来的第一感受是“政治表达可以归于日常”。“普通民众脸上从容和放松的神情”让我开始重新审视那套熟得不能再熟的叙事：

- “资本主义水深火热”？——我在超市看到了低价牛奶，在地铁看到了微笑，在街头看到了游行队伍背后的警察维持秩序而不是驱散。

- “西方打压中国”？——跨国企业的财报告诉我，数据不会爱国；中国区下滑得肉眼可见。

- “我们自主创新已领先”？——一旦芯片被“卡脖子”，一些“民族之光”就会集体喘不上气。

比较出的结论朴素到有点冒犯：法治让聪明人有舞台，专制让聪明人有“后台”。

我与先生：在历史里对表，在现实里校准

先生比我早看明白。他提醒我：专制的底层逻辑，是“欺骗 + 暴力”。

欺骗，是把黑说成白、把侵略说成反侵略、把受害者说成“境外势力”；

暴力，是把年轻的呐喊变成档案上的污点，把公民的发声变成刑法里的罪名。

我们一起复盘中共的“发家史”：延安贩毒维稳财政、

土改与大跃进的人祸、文革的道德灭绝、“六四”的屠杀、活摘与维稳产业、修宪复辟……这一切不是“偶发”，而是体系的必然。

在这样的历史里谈“岁月静好”，像在流水线上谈“手工艺美学”。

为什么必须反共：因为我还想做个人

如果要把我的反共理由压成三句话：

(1) 为了事实

历史必须可被查证，新闻必须允许反对。没有真相，一切“成绩单”都是作文。

(2) 为了专业

科学需要自由的试错与坦诚的失败，医疗需要独立的监管与可问责的制度。当权力凌驾于规则，专业就变成手艺，手艺再好，也做不出良心。

(3) 为了尊严

人不是工具，更不是 KPI 的消耗品。尊严来自表达、结社与选择的自由，来自“可以说不”的权利。当一个社会只允许说“好”，坏事就会变成大事。

结语：把恐惧变判断，把愤怒变行动

离开不是逃跑，发声不是作秀。那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的负责，对家人的健康、对职业的操守、对事实的敬畏、对未来的期待。

如果你也感觉到风在体面与谎言的裂缝里灌进来，不妨先从最小的行动开始：

- 学会分辨“新闻”与“通告”；
- 给不同观点一次耐心；
- 在每一次“要不要说”的时刻，至少让自己听见自己。

醒悟不嫌晚，改变亦然。

Waking Up in Shanghai: Why I Became Anti-Communist

This essay traces a personal journey from conformity to awakening—from a Shanghai professional who once sought only a "quiet life" to a citizen who realized that silence under tyranny is complicity. Through family history, corrupted science, workplace exploitation, and the suffocating absurdity of COVID lockdowns, the author confronts how lies and fear shape every layer of Chinese society. Abroad, comparison revealed the truth: law, not propaganda, sustains dignity. To oppose the CCP is not rebellion but self-respect—to defend fact over fiction, professionalism over obedience, and humanity over fear. Awakening is not betrayal; it is reclaiming the right to be huma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墙内觉醒到海外呐喊

——我的“六四”纪念与民主传承之路

作者：卢超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从中国大陆“墙内觉醒”到美国自由土地上持续纪念“六四”的心路历程。作者回忆了最初通过“翻墙”接触天安门真相的震撼与愤怒，描写了觉醒后的精神挣扎与行动转变，并讲述他在海外加入民运、参与纪念活动、延续民主火种的经历。文章以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叙事，展现出一位普通中国人从沉默到发声、从恐惧到坚持的灵魂觉醒与信念传承。

夜色在窗外漫开，电脑屏幕是我唯一的光源。那一年，我二十多岁，一个在体制内长大的普通青年。那时的我，从未听过“六四”这两个字。我们在课本里学“改革开放”，在电视里看“盛世中国”，而“真相”似乎从不属于我们。

可那天，我出于好奇，打开了一个陌生的窗口——翻墙。

屏幕那一端的世界，与我熟悉的一切格格不入。

嘈杂的喊声、飘扬的横幅、年轻的面孔、坦克的轰鸣。

我看见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唱《国际歌》，看见学生代表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前，也看见午夜的枪声与血迹。

我呆坐在那张旧木桌前，手心渗出冷汗。

原来，我被教育去“爱”的国家，曾经这样对待他最纯洁的孩子。

那一刻，我心底的某种秩序坍塌了。

我意识到，真正的“爱国”，不是沉默的服从，而是敢于说出真相。

那一夜之后，我的人生彻底改变。

我开始悄悄阅读被禁的书，偷偷保存那些视频。每当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谈“自由”或“人权”，我都会去留言、去辩论——哪怕账号被封、手机被查、朋友劝我“别惹麻烦”。

但我知道，我已无法回到从前。

那是一种“醒来”之后的痛苦，也是一种不可逆的召唤。

一、从沉默到发声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初到洛杉矶的那一年，我在唐人街的超市打工，夜里住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

但我终于能自由地上网，能在公共广场举起标语，不必担心第二天就消失。

记得第一次参加“六四”纪念集会，是在中领馆门

前。那天阳光炙热，我和一群陌生的华人站在一起。有人拿着扩音喇叭高喊口号，有人默默举着写着“悼念六四”的牌子。

一位白发老人颤抖着举起蜡烛，对我说：“孩子，我当年就在广场上。”那一刻，我喉咙发紧。那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活着的见证。

从那以后，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开始写文章、组织活动。我用文字记录真相，用行动纪念死难者。我们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在华府举行集会。每当我看到有人停下脚步、伸手接过传单，我就知道——记忆仍在传递。

二、烛光与誓言

每年六月四日，我都会穿上那件印有“64”的T恤。在自由雕塑公园的夜里，风轻轻拂过烛光，我与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同胞并肩而立。有人高唱《自由花》，有人在祷告。烛光在夜色里微微颤动，就像那些逝去的灵魂在回应。

我常常抬头看那片星空，想着：三十多年前，北京的夜空下，也曾有同样的星星，只是被烟雾与火光遮蔽。如今，我们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把那盏烛光重新点亮。

有时我会想到，如果那些年轻人还活着，他们今天也许已是教师、记者、工程师、父亲、母亲。而他们的理想：公平、法治、尊严，仍在召唤我们。那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

三、自由的道路

民运不是浪漫的诗，它是流亡者的血泪，是被审问、被放逐、被误解的坚持。但我没有后悔。我相信，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唤醒；每一场纪念，都是一次延续。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谎言，却在真相中重生。“六四”的烛光点燃了我心中的火，也照亮了前方的路。

有时我在深夜写作，电脑屏幕上的光映在墙上，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间狭小的屋子。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害怕黑暗。

因为我知道，有无数个我，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守护着同一份信念。有一天，当自由真正降临那片土地，当我们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为那段历史默哀、为那群青年献花，我会告诉自己——这一声声的呐喊，值得。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双十”精神与自由中国

——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击碎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也点燃了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火种。辛亥革命并非完美，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人民的名义推翻专制的革命，是第一次以“共和”为目标建立国家的政治实验。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主权在民”的理念，从此，“国家属于国民”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起点。中华民国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名称，更是一种政治信念的象征——它代表了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政府，宪法高于个人权力，言论自由不被恐惧压制的国家构想。这正是今日台湾得以成为亚洲最自由、最开放社会的根基。

然而，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被彻底篡改。中共篡权建政后，不仅摧毁了民国的制度与记忆，更用系统性的宣传机器将“中华民国”从教科书、报纸、银幕乃至集体记忆中抹去。中共以“新中国”的名义，掩盖了自己通过暴力、内战与苏联支持建立政权的事实，将“中华民国”污蔑为“反动政权”，将“台湾”诬指为“叛离祖国的一部分”。这种谎言延续至今。中共的历史叙事中，辛亥革命被“截断”，孙中山被“篡改”，民国被“抹黑”，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被包装成“新生”的、唯一合法的中国。但事实上，中共并非中华民国的继承者，而是它的篡夺者。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从未中断，它在台湾延续、改革、发展，成为真正代表“自由中国”的国家。

任何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自由选择与公开授权。中共从未通过全民选举获得统治地位，它依靠的是枪杆子、恐惧和暴力。1949年后，它在“解放”的口号下镇压异议、摧毁民间社会，制造了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文革”中对人性的肆虐、“六·四”枪声下对人民的屠杀，以及当今对维吾尔、西藏、香港与异议公民的迫害。这样的政权，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正当性，更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共常以“主权”和“统一”作为统治的最后遮羞布，但问题是：一个没有民意授权的党，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一个篡改历史、剥夺公民自由的政权，有什么资格谈“国家尊严”？真正的中国尊严，不在于统一版图，而在于是否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尊严。

而台湾的存在，是对中共谎言最有力的反驳。在那里，中华民国的宪政精神得以延续与升华。从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到李登辉推动民主化，再到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的政党轮替，台湾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

人完全有能力在民主制度下实现良治。台湾有独立的军队、政府、司法体系、货币与护照，实行自由选举，政权和平交接，这些都清楚显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所谓“武统台湾”的威胁，不仅是对台湾自由的挑衅，更是对辛亥革命精神的彻底背叛。那些曾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先烈，绝不会容忍一个新的独裁政党再度奴役中国人民。

七十多年来，中共刻意混淆“党”与“国”，把爱国主义绑架为对党的忠诚，把质疑政权等同“叛国”。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说明：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共产党。中国属于十四亿人民，而不是中共少数特权者的私产。真正的爱国，是希望祖国摆脱谎言与恐惧，是让中国人拥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让孩子们读到真实的历史，不再被洗脑教育所蒙蔽。中共把“统一”当作掩盖腐败的口号，把“民族主义”当作转移国内矛盾的工具。但在信息自由流通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觉醒：他们看见台湾的新闻自由，看见香港的悲剧，看见乌克兰人抵抗暴政的勇气，也开始质疑自己长期生活的国度。

我们呼吁中国大陆人民：觉醒吧！不要再被虚假的“民族大义”绑架，也不要再被“西方阴谋论”吓倒。要问自己：为什么在中国，批评政府要坐牢？说真话要匿名？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民却不自由？为什么一党统治要靠防火墙与审查维持？

自由不是外国的特权，它是人类的普遍权利。民主不是混乱，它是制度化的监督与和平更替。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正是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可行。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华民国的国旗不仅在台北升起，也将在大地的天空再度飘扬。那一天的到来，取决于每一个愿意追求真相、拒绝谎言的中国人。

“双十”不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一面旗帜。它象征着推翻暴政、追求共和的勇气，象征着自由中国仍在延续。今天，我们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不只是庆祝一个国家的生日，更是在捍卫一种信念——那就是：自由与真理，终将战胜谎言与恐惧。

中共可以禁言、可以封网、可以制造恐惧，但它无法消灭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因为那火种，早在1911年10月10日，就已点燃。而今天，我们要让那火光，再次照亮中国的夜空。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人的反抗

作者：何愚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李杰 翻译：彭小梅

这是我在疫情期间拍到的一些在电梯里的照片。

他们的脸有的被挖了眼睛，有的被扣了嘴巴，有的被涂鸦。这样的照片我有几十张，我每到一个陌生的电梯里，我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于是我就用手机拍了下来。

疫情最严的那段时间，我被封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小区的大门被封条封死，铁栅栏拦得密不透风。快递进不来，物资靠抢，核酸排长队，有时候咽口水都像犯法。那段日子，手机成了我唯一的信息来源，电梯成了我和世界唯一的接触点。

就是在那个狭小的电梯里，我一次次看见那些“网格长”的照片。

每一张都差不多：红底证件照，身穿蓝马甲，名字、手机号、社区电话、监督电话，一应俱全。贴得规规矩整，看上去像是“服务群众”的标牌。

但几天后我发现，那些照片开始“变形”。

第一张脸被人用钥匙划破了，从额头一直到下巴，像一道刀口。过两天，有的照片被烟头烫得焦黑，鼻子和嘴巴几乎被烧没。有的被泼了墨水，有的贴上黄色符咒，还有的整张脸被涂得乱七八糟，只留下白色眼白在黑油里发亮。

我知道，这不是无聊的人在破毁。这是歇斯底里的反抗，这是民众对政府唯一敢做的行为。是中国古代的厭胜之术。是一种极度压抑下的反抗。

不是反抗“党兴军”这个人，而是反抗她代表的那套系统——

她只是被选来贴在电梯里的脸，但背后是封控命令，是24小时看守，是“有困难找网格长”的口号和“你不配知道政策”的冷漠，是你家门被焊死时她不接电话，是你阳性了没人管、她却催你签字“自愿隔离”的那份纸。

他们说：“网格长是为大家服务的。”

可在疫情里，他们变成了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变成了小区里最大的权力节点。他们可以决定谁能出门，谁不能；谁能领菜，谁被落下；谁家的门被钉死，谁家能留条缝通风。

没有申诉渠道，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法律支持。那些被误封、被殴打、被饿得崩溃的人，求助无门。

所以人们开始对电梯墙上的那张脸下手——不是因为疯了，而是因为他们终于明白：没有人会替你说



话，也没有人会替你出头。你唯一能做的，是毁掉那张代表权力的脸。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应该是最后的选择。但在中国，这是人们唯一的选择。

疫情之后，我重新回看这些照片，有种深深的恐惧。

中国不是没有反抗，只是没有被允许存在的反抗。不是没有愤怒，只是这些愤怒被逼到最隐蔽的角落。一个国家，连“骂一句”都变成风险，百姓只能靠“划脸”来发泄，这样的治理，不是文明，是极权的深水区。

“网格化治理”使中国真正变成一个世界超级大监狱。从新疆的“再教育营”，到西藏的“维稳尖兵”，再到疫情期间全国范围内的居家封控，国家机器把每个人都装进了格子里，大格子套小格子，层层管理。每层大门都有一个钥匙的掌管者。

而网格长，就是这些格子的最小单元。

没有铁门、没有高墙，但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被盯着、被记着、被系统标注着。

这些照片深深地触动了我。不是因为它们多残酷，而是因为它们太真实。它们不是拍出来的新闻，而是压抑出来的证据。

它们证明，普通人不是没有感受，是不明事理。他们只是没地方说，只能在最微小的空间里，对抗一整套国家系统（用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血打造的政府系统）。

我们终究不是木头。我们也想活得像人。但在这个体制下，连这一点尊严，都变成奢望。

在中国，有一群人，他们曾经悄悄地，在电梯里，诅咒过那个逼他们沉默的人。

他们不是疯子。他们只是活不下去了。

国殇诗

作者：张善城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长夜沉沉压九州，
铁幕如山血未收。
百姓哀吟声未绝，
赤祸余魂积旧仇。

推墙倒塌人心聚，
怒火燃烧似海流。
推翻暴政人人责，
审判独夫刻不休。

黎明微曦越黑暗，
自由曙光满神州。
青史千秋公义在，
真理终将斩魔头。

十一悲山河，
啼血祭国殇。
暴政虽横绝，
自由自久长。



没有国庆 只有国殇

——旧金山华人社团反抗中共暴政 76 年

作者 / 编辑：袁岷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培训站站长

在自由世界，国庆日是举国欢庆之时，而共产政权的“国庆日”则截然相反：每年 10 月 1 日，各国中共领馆前却只有抗议和谴责声。

10 月 1 日，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维吾尔人社团、西藏流亡社团、香港人社团齐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抗议中共非法政权统治及迫害中国人民 76 年。

活动组织者之一、中国民主党旧金山组织部长胡丕政说，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庆祝，而是为了哀悼。76 年来中共不断发动各种政治斗争，数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中共给无数中国家庭带来深重灾难。我今天带来的不仅是一张海报，而是一面血淋淋的镜子。76 年来，中共的政权正是踩着一代又一代死难者的头颅走到今天。

旧金山民主人士关永杰说，每年“十一”都参加活动抗议中共。他认为，这个政权给全世界造成大麻烦：它在国内欺压人民、“割韭菜”，把人民当“党产”，遇到任何政治危机，就把人民推出当成挡箭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人类的悲剧，对全世界、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悲剧。关永杰期盼中共早日倒台，消除对亚洲邻国及美欧等自由世界国家的威胁，让全世界回归和平安宁。

在场的还有主张“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香港人公共事务组织，以及希望脱离中共集权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社团，他们齐声呼喊：“打倒共产党！”、“共产党下台！”、“Free Hong Kong！”、“Free East Turkestan！”、“Free Tibet！”，声音响彻中共领事馆。



No National Day — Only a National Tragedy

San Francisco, Oct 1, 2025 — On China's "National Day," democracy activists from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San Francisco), Chinese Human Rights Alliance, and Uyghur, Tibetan, and Hong Kong exile groups gathere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condemn 76 years of CCP tyranny. Organizer Hu Pizheng said, "We're not celebrating but mourning—the regime stands on generations of victims' blood." Protesters shouted, "Down with the CCP! Free Hong Kong! Free East Turkestan! Free Tibet!" turning the day into one of remembrance, not celebr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守望民主未来

撰稿：王梦梦

摄影：韩立华 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校对：熊辩

【洛杉矶讯】2025年9月20日上午，基督徒民主守望联盟在负责人王中伟的组织带领下，走进“六四”驻洛杉矶纪念馆，举行悼念与祷告活动。

活动于上午九时五十分正式开始，成员在馆门口集合签到。简短介绍后，由潘蒙恩带领开场祷告。随后，纪念馆工作人员刘敏引导大家参观展厅，并通过展品与史料讲述“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

在“烈士墙”前，全体成员肃立默哀，向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其后，联盟代表向纪念馆负责人递交捐款，纪念馆方面致辞感谢，并强调将继续承担守护历史与真理的使命。

多位参与者分享感受。张建平表示，透过一张张历史照片与实物，感受到那一代学生和老师的血与泪，令人痛心，但也相信神必纪念他们的付出。张娜说，代入当年学生的处境，更觉牺牲不会被掩盖，真相终将传递给后代，光明必将战胜黑暗。潘蒙恩指出，这段历史震撼人心，提醒世人唯有真理与公义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与和平。姚庆古强调，“六四”的残酷历史让人深受触动，基督徒应守护真相与正义，绝不能沉默。晏荣金则表示，这次参观让他更加确信：历史必须被记住，真理必须被传扬，而信仰正是赐人坚持与盼望的力量。

最后，王学光牧师以祷告作结，呼求上帝赐下安慰与力量，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使信仰的灯火长明。

活动于中午十二时圆满结束。此次悼念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真理与信仰的坚守。与会者一致强调：历史必须被记住，真理必须被传扬。愿公义如滔滔江水，让从神而来的和平与自由真正降临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



Watching Over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Los Angeles, Sept 20, 2025 — The Christian Alliance for Democratic Watch, led by Wang Zhongwei, held a solemn memorial and prayer gathering at the June 4th Memorial Hall in Los Angeles. The event began with an opening prayer by Pan Meng'en, followed by a guided tour from memorial staff member Liu Min, who recounted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rough photos and artifacts.

In front of the Wall of Martyrs, participants stood in silence to honor the fallen. The Alliance presented a donation to the memorial, whose representatives expressed gratitude and vowed to continue preserving truth and memory. Several attendees, including Zhang Jianping, Zhang Na, and Yao Qinggu, shared reflections emphasizing faith, courage, and the triumph of truth over darkness.

Pastor Wang Xueguang closed the ceremony with a prayer, asking God to bring comfort, strength, and lasting peace. The event served not only as a remembrance of history but also as a renewed commitment to uphold faith, justice, and freedom for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共病毒巡游队伍到达华盛顿国会

2025 年 9 月 18 日 · 华盛顿

作者：杨长兵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程铭 校对：熊辩

“CCP VIRUS”巡游队伍在著名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带领下，于美国国会大厦会见了国会办公室主管皮耶罗·A·托齐 (Piero A. Tozzi) 。

代表们指出，中共不仅是新冠病毒制造与扩散的始作俑者，更通过隐瞒疫情、操控信息，严重破坏全球公共卫生与自由环境，必须承担国际社会的追责与赔偿。代表们同时强调，中共还是一种“思想病毒”，通过渗透、宣传与跨国打压，不断迫害在美及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严重威胁美国社会与全球自由。

Piero A. Tozzi 在会谈中表示，将把相关情况向议员办公室详细汇报，并持续关注涉及人权与言论自由的议题。“CCP VIRUS”巡游队伍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本质，共同追责中共的全球危害，维护人类的自由与尊严。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用车轮丈量信念

——“CCP VIRUS 美东行”纪实

作者：杨长兵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CCP VIRUS 美东行”巡游队伍今日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星光大道中国剧院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举行盛大的抗议活动。

著名雕塑家陈维明先生驾车拉着“CCP VIRUS”雕塑领航巡游。中国民主党党员与自由志士们高举横幅，高呼口号：

“结束中共！”

“追究中共制造与释放新冠病毒的责任！”

“赔偿全球受害者！”

“释放所有政治犯！”

抗议者在中国剧院门前与总领馆外高声呐喊：“结束中共！”“释放王炳章！”“释放高智晟！”“自由中国！自由香港！”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民众与游客驻足关注。

陈维明先生与金秀红女士分别在中国剧院前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发表演讲，痛斥中共祸害人类、危害世界，呼吁国际社会追究中共制造并传播新冠病毒的罪责，并要求中共向全球受害者进行赔偿。

此次“CCP VIRUS 美东行”历时整整一个月，全程近八千英里，穿越二十个州，拜访数十个政府单位与著名景点。一路上虽历经艰辛、风餐露宿，但队员们始终秉持信念，坚持用行动揭露中共暴政、捍卫自由真理。这不仅是一场跨越美国东西部的巡游，更是一段精神的征程——他们用车轮丈量信念的力量，用呐喊唤醒良知的回响。



Measuring Faith by the Miles — “CCP Virus U.S. Tour” Reaches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Oct 2025 — The “CCP Virus U.S. Tour” arrived at Hollywood’s Chinese Theatre and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Los Angeles, drawing crowds of onlookers and supporters. Led by renowned sculptor Chen Weiming, who drove a truck carrying his “CCP VIRUS” sculpture, member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pro-democracy activists rallied under banners reading “End the CCP!” and “Fre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Chen Weiming and Kim Soo-hong delivered impassioned speeches condemning the CCP for unleashing the pandemic and calling for global account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victims.

The month-long journey covered nearly 8,000 miles across 20 U.S. states, visiting dozens of landmark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Through exhaustion and hardship, participants kept their conviction—using their wheels to measure faith, and their voices to awaken conscie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民运风采

郭斌 & 张维清

作者：王连江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林小龙

郭斌，1994年生，吉林人，翻译学硕士。曾荣获全国大学生翻译比赛研究生组国家级一等奖，并担任过新航道考研英语讲师。因不满社会不公，揭露当地派出所的黑幕而遭受打压与威胁，最终毅然来到美国。

他如今奋战在民运前线，目光坚定，语调铿锵，举止间透出推翻中共法西斯政权的勇气与决心。活动现场，他翻译迅捷流畅、沟通自如，展现出深厚的英语功底与自由斗士的风采。



Born in 1994 in Jilin, Guo Bin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won China's national graduate translation championship. After exposing police corruption and facing persecution, he f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Now active on the frontline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his sharp translation and fearless voice reflect both linguistic talent and the steadfast courage to challenge tyranny.



中国民主党党员张维清，致力于推翻中共独裁统治和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

他北上旧金山，抗议习近平；去中领馆抗，抗议中共暴政；去雕塑公园，纪念被封禁的历史；去六四纪念馆，悼念天安门广场罹难者；加入《在野党》杂志社人权观察部，收集中共每天的侵犯人权事件。中国的民主之路，充满艰辛和挑战，但他不会停止抗击中共的努力和抗争，直到中共倒台！

China Democracy Party member Zhang Weiqing is devoted to en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ictatorship and realizing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 in China. He has traveled north to San Francisco to protest Xi Jinping, stoo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denounce tyranny, visited Liberty Sculpture Park to honor the banned history, and paid tribute at the June 4th Memorial Museum to the Tiananmen victims. As part of the Human Rights Observation Department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magazine, he documents the CCP's daily human rights abuses.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is long and full of obstacles, but Zhang vows to never stop resisting—not until the CCP falls and freedom rises.

自由钟民主基金会：从象征到机制

—— 在新冷战格局下的海外华人民主动员

文 / 陆乾坤 《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一、缘起：为什么是“自由钟”

“自由钟”原是美国建国精神的象征，与独立、宪政和公民权利紧密相连。2024年7月27日，多位活跃于海外的华人民主人士在洛杉矶宣布成立自由钟民主基金会（Liberty Bell Democracy Foundation，下称“自由钟基金会”），以“自由钟”这一象征凝聚海外追求自由、反对极权的力量。成立仪式上，王丹、胡平、陈维明分别获颁“自由精神奖”“自由思想奖”“自由艺术奖”，确立了基金会以思想、行动、艺术三位一体推动民主事业的方向。

二、组织画像：新组织，旧命题

自由钟民主基金会注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玫瑰岗（Rosemead, CA），在GuideStar数据库登记为非营利机构（EIN 99-3640049）。其宗旨明确：

“团结并支持一切反对极权统治、追求自由民主的党派和个人，唤醒公众的宪政意识，促进中国体制的和平转型。”

该基金会试图在理念上建立海外民运的“最小公约数”，将思想倡导、援助行动和国际传播结合为统一平台。

三、事件时间轴：从宣布成立到“自由钟”落成

- 2024年7月27日：洛杉矶成立大会举行，提出“思想—精神—艺术”的三维价值框架。
- 2024年9月29日：在加州耶莫（Yermo）自由雕塑公园（Liberty Sculpture Park）举行“自由钟落成典礼”。自由钟民主基金会为主办方之一，仪式包括揭幕、敲钟、宣誓与集体发言，标志着该组织从“理念发布”迈向“实体落地”。

此举使“自由钟”从象征转化为可持续的公共空间符号，也让民主叙事在海外形成可感的地理坐标。

四、生态位：海外民运的“通用接口”

自由钟民主基金会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希望成为跨组织协作的公共接口层：

- 叙事接口——以自由、宪政、人权为共同语汇，为不同派别提供共享的价值模板；
- 资源接口——以合规募资与透明拨付支持民运项目，整合分散捐赠；
- 技术接口——提供媒体、法律、数据安全等工具库，减少重复建设。

其视频频道、论坛与仪式活动已初步构建了这种多接口的协作框架。

五、方法论：从“鼓动性政治”到“制度性政治”

要从动员走向治理，基金会需完成五项制度化转化：

- 闭环化治理——建立使命-项目-预算-评估链条，发布年度项目报告与第三方审计。
- 合规筹资——完善 501(c)(3) 身份、反洗钱与匿名捐赠机制，保障支持者安全。
- 内容矩阵——构建议题库、内容库、渠道库，实现多平台传播。
- 联合行动日——定期同步行动，形成跨平台声量。
- 青年训练营——培养媒体、法律、组织运营人才，打通代际断层。

六、比较与互补：与既有力量共舞

自由钟民主基金会的特色在于“共建”而非“取代”。

- 与自由雕塑公园共建纪念与展演场域；
- 与思想出版社群合作推出研究与评论；
- 与法律援助网络共享个案资源；
- 与多语媒体共建跨语传播矩阵。

这种“模块化协作”能最大限度降低组织壁垒。

七、风险地图：红、黄、蓝三级预警



- 红色（高风险）：跨境追责、网络攻击、资金指控；
- 黄色（中风险）：舆论抹黑、内部分歧、议程被动；
- 蓝色（低风险）：筹资波动、志愿者流失、治理滞缓。

应对策略包括零信任数据体系、外部审计、冲突调解及轮值机制。

八、十二个月行动清单

1. 制度建设：公布章程、建立项目SOP、发布《合规白皮书 1.0》。
2. 项目孵化：设立五个微基金（政治援助、法援、媒体、青训、对话）。
3. 传播矩阵：每周视频播客+每月报告，与《在野党》等媒体联动。
4. 资金透明：季度财务公开、年度影响力报告。
5. 场域运营：以自由雕塑公园为核心举办季度论坛与展陈。

九、量化指标

- 动员：月活跃志愿者、跨组织协作次数；
- 传播：订阅增长、完播率、外媒引用；
- 影响：援助个案、培训人数、项目转化；
- 合规：披露频率、审计结果、零安全事件月数。

十、三类质疑与回应

1. “新瓶旧酒”——以制度化和数据透明回应象征性批评；
2. “政治色彩过浓”——以专业化与跨界合作化解标签化风险；
3. “透明度不足”——建立第三方审计与公开项目库。

十一、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关系

自由钟民主基金会若能实现“把意义生产交还给公众”，将成为海外民运的可复制样板：

- 议题层面：将宏大口号化为选举制度、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公共议题；
- 方法层面：倡导协作式行动，让普通人参与史料、众筹、社区活动；
- 结构层面：以工具化、标准化降低参与门槛。

十二、结语：下一次敲钟之前

从洛杉矶的成立仪式到耶莫的落成鸣钟，自由钟民主基金会已完成“宣示存在”与“空间落地”的两步。未来的考验在于：能否将象征转化为机制、情感转化为制度、动员转化为供给。唯有实现这三重转化，海外华人社会才会看到一个可持续、可信赖的公共平台。



疫情三部曲（番外）

——蚊城记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堵水以防蚊，正如捂耳以止鸣；于是耳朵静了，蚊却在心里飞。”

今年城里忽然多了个新名词，叫“基孔肯雅热”。名字绕口，像一条打结的绳。绳子一打结，许多脑袋便舒坦了：有了名词，就有对策；有了对策，就有公文；有了公文，就有成绩。成绩要上墙，上墙之前，先把城里的下水道一律装上纱网。纱网雪白，像给井口盖上了被子——盖得很孝顺。

纱网的用处，公文说得极详：可阻蚊、可断链、可护民。只是雨来了，雨不识字，冲到纱网上，犹豫了一下，便站成一汪汪积水。积水里蚊子生得更勤，像遇到了公费的产房。于是有人建议再加一层更密的网，以杜后患。网越密，水越闷；水越闷，蚊越壮。壮到黄昏时分，黑云一抖，城便响成一锅。

我在街角看见几个小吏捧着卷尺，蹲在井边丈量“网孔标准”。他们一丝不苟，像在选拔孔雀的羽。丈量完了，便抬头望天：今日任务饱满。饱满是个好词，像刚煮开的馒头；只是馒头若闷在笼里，久之也会落水。落水的馒头不易咽，但仍可统计为“发放完毕”。

对策不止一条。为了“源头斩断”，城里又想到了菜园。说菜园滋水，水滋虫，虫滋病。于是派人去封，水泥推成白浪，一浪浪扑到青菜上。青菜来不及喊，便直挺挺站成了纪念碑。纪念碑的题名叫“环境整治”。整治之后，蚊子仍在；只是菜不在了。没有菜，便少了积水；少了菜，也少了人心——人心向来怕见水泥。

有个老夫妇守了一角方寸的土，种的是葱与蒜。蒜不怕味重，葱不怕天冷。小吏来时，他们把锄头立脚边，问：“这也封？”小吏笑，笑得像公事包的扣：“封一点，放心。”于是水泥从葱蒜根部缓缓爬上来，像一层殷勤的霜。老头沉默，老太太问：“那蚊子呢？”小吏更笑：“我们还要全民抽血呢！”老太太一怔，像被门把磕了额头。

抽血是更科学的法子。科学这两字一出，人人肃然。队伍像旧年核酸时那样排起来，袖子挽上去，血管一根一根报到。管子收满了，放在银亮的托盘里，像一排不容争辩的红逗号。逗号多了，句子就长；句子一长，意义便由上面解释。解释里自然免不了几个好听的词：监测、预警、筛查、呵护。呵护是好词，尤其对流动的血说起，显得极为体贴——仿佛血是国家的，共有的，暂住在你体内，随叫随到。



抽完血的手臂上贴一张小方片，像兵营里的号牌。有人问：“我并不病，为何抽？”答曰：“大局需要。”大局是个无形的胃，饿的时候，会把零碎的日子一并吞下。吞下之后，过几日又说饿；于是再抽。抽血的好处，在于看得见：袋里鲜红，统计报表也鲜红。至于井里积水、天上蚊云、菜地水泥，那些颜色不太入账。

我在报上见到一则图解，标题写：“从源头到末端，织密防蚊网。”图上箭头四方八面，像四个队长同时指挥操练。操练需要队列，队列需要口号，口号需要响亮。于是街道有了喇叭，喇叭里有了“请立即处理自家积水容器”的慈声；又有“如发现阳性滋生地，立即报告”的威声。慈威交替，像老旧钟楼撞了晴天。钟楼从不去井边看一眼，它只负责数点。

人间也有“看一眼”的人。他们蹲在井边，翻起纱网的角，想让水顺一顺。水顺了一小会，蚊也跟着顺。顺到一个拐角，又被另一层网截回。便像旧年防疫时，门洞贴着黄条，黄条贴得比风还疾：此巷通而不通，此路开而不开。老母去买药，绕了三道封条，回家药晾成了纪念品。那会儿城里学过一门绝技，叫“静默”。静默时，蚊子也静默；等一声令下，蚊子复活，人还要排队学习复活。

如今这门学问又翻出来。小吏戴着红袖标，会看网，会找水，会训话，也会合影。合影时，他们竖起大拇指，背景是刚封完的菜地。菜地不言，泥里渗出一点汁，像一张擦得太勤的脸。旁边贴了一张告示：“此处整改到位。感谢配合。”配合这词再度回归。它像一把万能扳手，套在谁身上都刚好。只是常被套的那批人，

肩膀渐渐低了半寸。低半寸，才合群。

蚊子的学问，不在诗里，在水里。下水不畅，蚊便畅。纱网盖住了洞，没盖住逻辑。逻辑是个怪物，最恨“为你好”的好心。好心若走到极端，便成了一种熟悉的姿势：先堵，再看；先封，再讲；先采，再说。说来都为众生，做去却沿着表格。表格像方格纸，落在城上，把生人都画成了工整的字。字里有笔画，笔画里有小小的倒刺，扎在谁身上，谁就负责“理解”。

红卫兵式的小傻也不难见：冲锋，喊口号，抬着喷雾机，一路驱赶人影和良心。良心跑不过制度，回头一看，自己已戴上红袖标——原来良心也能被征用。征用之后，良心学会了审核：谁家的桶没倒，谁家的窗没关，谁家的狗碗积了水，谁家小孩笑得太响。笑得太大响，容易招蚊；于是笑也得抽查。抽查久了，人便学会了“安静生活”，像旧年的“安静小区”：出门凭证，进门扫码，咳嗽报备，呼吸限频。

我在心里替这些词排了一个家谱：封控生封条，封条生关卡，关卡生告示，告示生口号，口号生合影，合影生总结，总结再生封控。至于蚊？蚊是旁系，见缝插针，逢雨成灾。灾与封控互相倚仗，彼此成全，像两条握在一起的手：一条冷，一条热，最终都伸向了你的手臂——抽血那一刻，针头入皮，谁也不问你愿不愿意，谁也不问井底的水愿不愿意。

有人说：这不过是一阵子；过阵子雨停，蚊散，网烂，泥干，一切复旧。复旧这词很安慰，像给病人说“明日就退烧”。只是城里有一种热，不是热度，是热心——热心铺出来的路，直通封控的旧仓库。仓库很大，里面堆着“三年所学”：封、卡、扫、查、报、贴、剪、封。每个字都练得极熟，像随时要上阵。上阵从来不缺号角，缺的是回头。回头一望，井盖下的水黑而静，静得像一个不肯再被打扰的夜；再望，水面之上，纱网正轻轻抖动，像一张没合上的嘴。

忽想起一位老友，旧年给我说：瘟疫教会人两件事，一是如何不去看，二是如何只看表面。表面是干净的证件，合格的栏杆，标准的网孔，热心的合影。至于井里翻腾的那点浑，最好不谈。谈多了，会被蚊叮：你传播负能量。负能量这四字像蚊香，绕你三匝，叫你昏睡。昏睡的人不会去翻网角，不会去拨水泥；昏睡的人最体面，适合合影。

雨点打在纱窗上，像数不清的小问号。我想去路口看看积水，撑伞下楼。楼下的井口戴着新网，网目细得像强迫症；旁边的菜畦是一整块新水泥，水泥上画了一个笑脸，似乎在安慰谁。我忽然起了一个坏心思，伸手把网角掀起一指；水在下面挪了挪腰，喘了一口气。那一口气里，似乎有去年冬天压下的叹息。我又把网放回原处，像把刀悄悄插回鞘。插得轻，才不会惊动什么“整治小组”。

回到屋里，我把这篇文章放在桌上，像一块没凝固

的水泥。它若干了，会裂；裂纹里要长草。草长出来，蚊也会来。到那时，或许又有人提议：再加一层更密的网。网格如棋，棋子的去路便少了一半。至于城，照样会出通告、排队、抽血、合影；照样会把“为你好”印成红字，贴在每一道我们必须经过的墙上。墙越来越白，心越来越黑，蚊越来越肥，水越来越闷。只有雨，还是那样落下——落在网的正中，发出轻轻的一声：噗。

倘有人问：如何防蚊？

我答：先让水走路，再教网做人；若还不成，先学会把门从里头打开，而不是从外头封死。至于抽血，且把针拔慢一点，慢到能听见那一点良心“咔嗒”入位的声。

Epidemic Trilogy (Epilogue) – The Chronicles of the Mosquito City

The Chronicles of the Mosquito City is a dark, allegorical satire exposing the absurdity of authoritarian bureaucracy masquerading as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When the fictional city faces an outbreak of chikungunya fever, officials rush to “eliminate the source” by sealing every drain with mosquito nets and paving over gardens with concrete. Their goal, framed as “protecting the people,” ends up breeding more mosquitoes, flooding the streets, and suffocating the city beneath layers of control.

Through lyrical yet cutting prose, the story mirrors the logic of China’s pandemic-era policies—an obsession with control, data, and propaganda. Citizens are coerced into endless blood tests and inspections, not for safety but for political performance. The mosquito nets become metaphors for censorship and restriction; the standing water, for the decay festering beneath the illusion of order. Every act of “protection” feeds the very chaos it claims to cure.

The author’s irony is both haunting and humane. Beneath the satire lies a warning about moral stagnation in a society where obedience replaces thought, and good intentions mutate into instruments of repression. In this world, even compassion is bureaucratized, and conscience must learn to whisper.

The story ends on a fragile note of resistance: to let water flow again, to lift the net, to reclaim truth and human dignity. For only when reason, empathy, and freedom are restored can the city—and its people—finally breath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君无戏言》之交子与学童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林小龙



有件大好事，人人谈得热闹：“国库要补窟窿了。”

窟窿倒不是城墙下的那个洞，而是深不可测的铜盆，只不过盆里原来是满的，后来变空了。空了便响，引来了新的规矩。

规矩很匠气：凡欲入学者，先缴一张“保单”。保单的名字很雅，叫“社保”。谁也不反对“保”，只是这保单一摊出来，便像一道门槛，门槛上写着字：不交者，不得入学。孩子夹在门槛里，脚尖搁着明亮的地砖，后脚跟还踏在家门口的泥土。家长便轮流递钱，像轮流给孩子喂药；药苦，则大家皱眉，笑着吞下。

发行者说这是为孩子长远着想。长远着想的词听来好听，实是新冠的词。长远往往在未来，这未来既远又空。于是人们把现在的饼，都先往未来送，仿佛未来会做饼给现在吃。只是以前的饼也被收了，说是“国用”；现在的饼再被收了，理由仍旧是“国用”。收得越多，国用却越显得空旷，如同一个被掏了心的库房，回声反而大。

当局发了条通告，通告里有图表，有箭头，也有笑脸。笑脸下写：“为公平、为未来、为稳定，请配合缴纳。”配合是个好词，谁不愿配合？配合像跳舞：跳不好会被说是“反动”，跳得好会被拍照登报。于是大家都学着配合，配合成了一种新的美德。只要配合，便能踩着节拍走路；不配合的，脚下一滑，连孩子的铅笔盒也掉进沟里去。

我去街上看一个卖豆腐的老太太，年纪不小，可手底下还带着青草味。她把豆腐摆在摊上，豆腐白得像雪。小孩跑来要买一块，用的是小攒的钱。老太太正要找零，忽听得隔壁告示牌里响起：“缴纳社保，方可登记学籍。”那小孩的眼睛一瞬变圆，像被摁在泥里的镜

子。老太太叹了口气，把钱退了又退，最终把豆腐递给了孩子。豆腐吃了，肚子饱了；学籍却像那告示，站在门口，毫不动情。

城里有位先生，自称读过书，笔下有几篇热闹的文章。他在报上写：“社保是良方，人人同缴，天下太平。”文字里有几个大字，像旗帜飘扬。旗帜下面有条注脚，写着：“对于困难群众，设有减免；但需依程序申请。”程序是个好朋友，朋友的作用就是把人推来推去，热得像炉子，推得像球。球越推越小，终于有人喊：球被踢进沟了。于是又有另一通告说要“强化落地措施”，落地原是好事，只是落得太多，地面都被踩得泥泞。泥泞里躲着许多小名词：补贴、减免、缓交，这些词像救生圈，个个空心，一圈又一圈，却都没有水。

更有一处叫做“白条窗口”的地方，专门受理“不交者的申诉”。窗口排队的人很多，队像一条睡着的蛇，头在窗前，尾巴在街角。窗口的小姐穿着制服，笑容很稳，像柿子皮。她说话有礼，动作有章，终于叫到一个家庭来申诉：老父携着证件，女儿眼睛里有昨夜的泪水。小姐翻阅证件、敲击键盘，语气平和地报告：“您可申请分期缴纳。”老父听了，像被拐了一圈的老钟，顿时不再转动。分期是个甜词，甜在遥远，咽下后味儿苦。

我问一个孩子：“若不给社保，孩子真不能上学么？”孩子眨眼，用力点了点头。他的点头里没有热度，只有一种被规定的命令感。于是家长们想了各种法子：借、卖、租、喊远房亲戚帮忙。借的是明天，卖的是今天，租的是老房子，喊来的是空城的回声。有人把家里的老手表卖了，换得了几张申领单；有人把祖传的镜子拿到当铺，镜子被磨平了花纹，映出来的是别人的面孔。

城里最荒唐的是，有个“学籍审查室”，门口贴着红纸，上面写着：“未纳社保者，暂停学籍。”红纸在灯光下像血，但又不像血，更像是被涂了光泽的宣纸。审查室里有几位老师穿着制服，他们的眼里有一种专业的冷，冷得像铁锅。他们问的问题很体面：家庭收入、缴费凭证、减免资质。回答完了，他们会合上本子，点点头，说：“按程序处理。”程序之外的东西，他们称之为“个案”，而个案里往往藏着一个人的一生。

偶有新闻把这些个案搬上荧屏，主持人挥舞着笑脸，说着“为全民福利打基础”的套话。镜头里有孩子

的背影，背影越小，音乐越庄重。音乐里混着几部门的名字，像菜肴里放了太多调味料，吃到嘴里就只剩味道，不见真菜。真菜被收去分配，分得太细，最后剩下一根骨头在碗里。骨头也有人夸“营养足”，夸的人把骨头当成礼物，送给视线不够远的人。

有个街坊在夜里给我讲：他听说国库有个“黑洞”，洞里装的是去年的几个项目、几个面子工程、几个口号的结余。洞口被覆盖过无数次，都撒上了厚厚的说明。说明里写着：财政稳健、稳中有进。但稳得像那张灰布，把下面的窟窿盖得平整，摸上去不着痕迹。于是有人就想：把那窟窿的账目，换成每家每户口袋里的几张票子也好。票子少的人便愁，票子多的人则笑。笑的人笑得高声，声音里有“国家”二字，像是牌匾敲得响。愁的人愁得低，低到连摇头也被当成不合时宜。

我看报纸，看见街边的广告写着“全民保障，共享未来”。共享未来的那“共”字挺大，似是一把撑开的大伞。伞下的人各自抱着自己的东西，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抱着账单。伞再大，也挡不住从伞边钻进来的冷风。冷风里有人哆嗦，有人装作不觉。装作不觉的人常常走得最远。走得远的人回来，口袋里有光亮的卡片——付款凭证。他们的表情像天平，一头是孩子，一头是证件。证件越亮，孩子越被放在天平的边沿。

见识多的人嘴里常念几句俗语，说：“从前交的是税，税也有规则；如今交的是保，保里却装着无数条纹。”条纹是老虎的皮，漂亮得危险。他摇头又摇头：“人啊，总把自己丢进方便里，等着别人把不方便的账单算好。”我问老学者：“可有办法？”他瞥了我一眼，说：“有话一定要说，且慢着点说；先看他们的笑容，后看他们的账本。”话说完，他又笑得很小，很像收了票的柜台。

我也有惶恐的时候。夜深人静，家里只剩钟表的“滴答”。我数着滴答，像数一种不见的税。窗外偶有灯火，是那些仍抱着希望读书的人。他们的影子在墙上拉长，像要走出窗外，走进那片被标注为“有学籍者可进”的光圈。可光圈再亮，也有边界。边界之外，便是生活的实物：柴米、铺盖、修理的单子。实物是厚的，热的，能当饭吃。光圈是薄的，远的，只能用来照梦。

到后来，我想起一句老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可这话在此处需改成：天下无难事，只怕没钱又要示范热心。示范热心常常在路灯下照出假影，人们被影子吓走，忘记本来的路。于是他们又来找我，问我怎样写信、怎样申诉、怎样证明贫困。

证明贫困可以证明许多事，却证明不了孩子的童年。孩子的童年需要时间，需要笑声，需要没有被单据刺破的手。单据刺手，是慢性的伤口，愈合得很慢，留的印子深且瘀。

我心里有点沉。沉得像压在胸口的一本账本，账本里有数字，有公式，也有缺页。缺页的地方，写着几

行小字：那年我们为了未来，把孩子的现在卖了。卖给谁？卖给了一个叫“国家”的名字。国家是个体面的大词，听起来自有光环。光环下的人有时在翻自己的口袋，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票子上的字因为频繁摩擦，都被磨成了空白。空白的票子还能换来笑吗？或许能，不过笑声里夹着账本翻页的声音，和那声音比起来，笑得再灿烂也显得苍白。

我却笑了，笑得不是快乐，而是挤牙膏时最后一滴从管口挤出，表面光泽，心里空洞。我想把这篇文章折成一张单据，递给当局；但递出去，又怕被盖章，于是我把它撕碎，扔在抽屉里。抽屉里本是压东西的，压久了，东西也变形。若有朝一日有人翻开抽屉，见到这些碎片，也许会把它们拼成一个孩子的脸。那孩子若问我：“这是我的脸么？”我会说：“是的，只是画得不完整。”孩子会不解，会眨眼。我只好摘下帽子，好似个考试不及格的老师，笨拙地把自己的帽子递给他，让他遮头顶的日光。

帽子旧了，透气，正好。

The Promissory Notes and Schoolchildren of a Ruler Whose Word Is Law

The essay “The Pledge and the Child” is a powerful allegory exposing the moral decay behind China’s bureaucratic “social insurance for school enrollment” policy. Beneath its poetic prose lies a sharp political satire: a nation’s treasury is described as a bottomless “cauldron with a hole,” and citizens are forced to patch it by paying arbitrary “insurance” fees before their children can attend school. Through vivid imagery—the tofu vendor, the uniformed clerk, the endless queues, and the red notices glowing like blood—the story depicts how ordinary families are squeezed between survival and obedience.

The author reveals how the state’s rhetoric of “fairness, stability, and shared future” masks a deeper cruelty: extortion disguised as policy, compassion replaced by procedure. Each paragraph unpeels another layer of systemic absurdity, showing a society where compliance becomes virtue and resistance becomes sin. By the end, the narrator folds his testimony into a piece of paper, hides it in a drawer, and imagines that one day someone might reassemble the fragments into a child’s face—a haunting metaphor for truth buried and memory erased.

This essay stands as a lament for dignity lost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and a quiet act of defiance: a reminder that even in silence, conscience still breath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 议想天开 " 王代时 - 父亲的故事

Sep 19, 2025

编辑: 钟然 翻译: 吕峰 校对: 林小龙
【转载自议报 链接: <https://yibaochina.com/?p=256570>】



王代时在 2025 年联合国第十七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开幕式上演讲。

我至今仍记得姑姑传来的那个消息，清晰得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你父亲死了。”我们已被这一不祥的预感煎熬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的父亲王炳章，是中国在押最久的政治犯。在我们收到那条死讯的时候，他已经被单独关押了17年。他在狱中身患多种疾病，多次中风。所以，他的死讯并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

不过，这个死讯被我证伪了。我从维吉尼亚州出发，一路辗转了30多个小时才抵达广东，决意要眼见为真，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弄清楚真相。行前，我发电邮给加拿大和美国的大使馆，告知了我的行程，并留下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要去中国调查我父亲之死。请确保中共会允许我回家。”我的亲人都为此提心吊胆，我太太提心吊胆，我自己也提心吊胆。但当我终于踏进监狱的大门时，我发现我的父亲——是的，他苍老了很多，但他还活着。

在独裁政权下，事情总是这样真假难辨。

跟许多那一代的中国人一样，我父亲及其家族也在毛泽东的统治下饱经了难以言说的苦难。1950年代，政权夺走了我祖父家仅有的奶牛场，使他们一贫如洗。几位亲人在政权政策导致的饥荒中活活饿死。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被一个嫉贤妒能的同学诬告成反革命，被打得几乎丧命。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毛泽东的肖像仍悬挂在天安门广场。而像我家这种在中国司空见惯的遭遇，却至今只能在私下议论。

但就像所有暴君一样，毛泽东也只是个凡人，他最终还是死了。毛死后，中国重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我

父亲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前往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留学深造。

在那里，他亲眼见证了一场全民公投。这场公投征询的是：“魁北克公民是希望主权独立，还是愿意继续作为加拿大的一部分？”

他深受震撼。主权在政治上是至高无上的议题，但加拿大却放心交由普通公民来决定。

身为一名爱国者，我父亲相信中国人具备同样的智慧与能力，并不比任何人逊色。为什么中国人民不能同样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呢？

于是，父亲在麦基尔大学学成医学博士之后，却放弃了前途无量的医学职业生涯，将毕生精力投入于为同胞争取民主权利。

他说过：“医生能治好一个人的病，但治不了一个国家的病。”

此后的20年里，他竭尽全力推动中国的民主。



他创办了影响深远的《中国之春》杂志及多个民运组织。他在世界各地奔走，为运动寻求支持，尤其致力于凝聚中国的年轻人。

为了协助组建反对党，他甚至不惜用假护照潜回国内。

为了报复他，中共撤销了他的国籍。但他拒绝加入任何其他国籍，坚持自己是、并会永远是中国的爱国者。

2002年，他赴越南去见他以为的一些中国劳工运动人士。但那是一个圈套。他遭到绑架，被跨境押送到中国，被草草地审判定罪。

在那场审判中，当局捏造了证据。但判处的刑期却是实实在在的：终身监禁。

当时我17岁，与父亲关系疏离，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居了。

但我深知，他和我们全家遭遇到了场巨大的不公——尤其当我看见疼爱我的奶奶终日以泪洗面，直到哭干了眼泪，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于是我暗下决心，至少要深入去了解父亲，以及那个迫害他的政权。这一切是从探监开始的，那也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当我看见他双脚锁着镣铐，被押进会见室时，我的心沉了下去。

隔着厚厚的玻璃与铁栏，我们父子二人坐了下来。

他拿起话筒，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代时，千万不要相信政权指控我的那些话。”

我告诉他，我不会信的。

自那以后，我去探监已经有十多次了。我逐渐领悟到，父亲那天对我说的那句话——不要相信政权的谎言——实在是意味深长。

显然，父亲对此是有着切肤之痛的，他深知中共是靠谎言起家、也必须靠谎言维系的极权政权。

并且他深知，中共维系权力的唯一手段就是残暴。

但人的良知永远会对残暴表示震惊。

所以，暴政唯一的选择就是撒谎。

他们谎称“六四屠杀”不存在。

他们谎称新疆没有集中营。

若你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父亲单独关押，就像我曾问过的，他们会回答说：“哦，我们没有单独关押。我们只是按照犯罪情况分组收监，而你父亲的案子又刚好比较特殊。”

多么方便的借口。

我还逐渐领悟到，我父亲这样的人与中共政权的一个本质区别，恰恰就在于是否愿意说谎。

对于我父亲来说，说真话是一种自尊，我相信对于许多在座的与会者来说也是如此。

我曾有一次探监时间他：“爸，你觉得对你的绑架，是否是中国政府幕后操纵的？”

你猜他怎么回答？“有这个可能，但我们没有足够证据坐实这一论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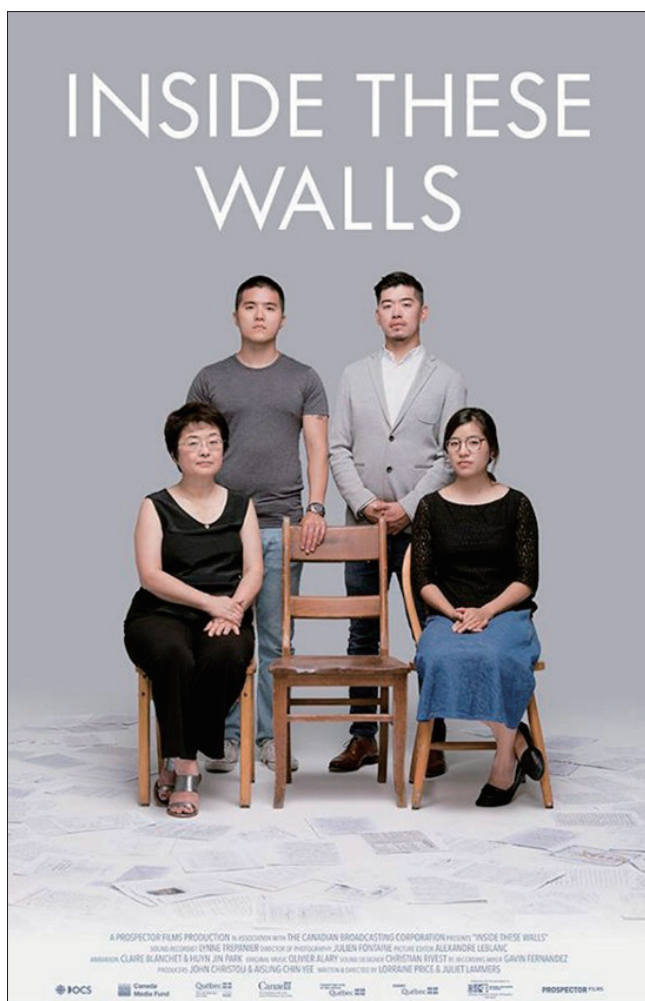
想想看，迫害者靠谎言让你身陷囹圄，而你反过来仍在坚持不能空口无凭。

终于，我领悟到，父亲这一生真正的意味就在于：追求真相与正义，这本身就是对人生至深的回报。

因此，在他的感召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选择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代言，为被欺凌、被压榨的弱势群体发声——而这往往也就意味着与中共对立。

如今父亲已年近八旬，我不知道他余生还有多少时间。但我知道他善用了自己的一生。他对原则、真相与正义的坚守，助我在可能动摇时保持了坚强。我希望这份坚守也同样能帮到你。

谢谢大家。



图为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2017年制作的纪录片《高墙之内, Inside These Walls》的海报, 向公众介绍王炳章以及他和家人的处境。图中的空椅子代表着家庭中缺席的父亲——王炳章。坐在左侧的是王代时的母亲宁勤勤, 右侧是妹妹王天安, 站立着分别是王代时(左)和他的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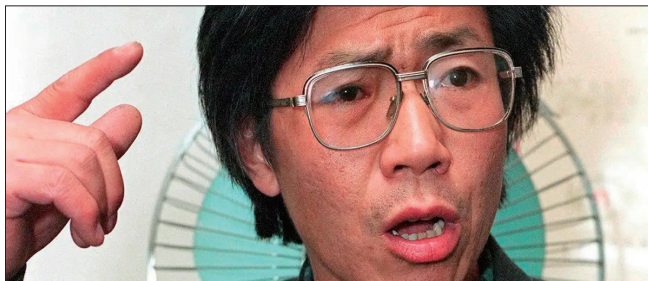
广东监狱流出的王炳章狱中照片

湖北组党第三波 - 党内外理性看待

作者：袁崛（中国民主党党史法规部长）

继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和海外后援会相继宣布成立后，组党进入第三波：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要求注册，照山东办。（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北京十一日电）

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是由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陈忠和、吕新华、任秋光、萧诗昌、刘飞跃、高进勤等七人共同发起。十日上午陈忠和、吕新华、任秋光等三人到湖北省民政厅社团管理处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与民主党山东筹委会遭遇到的情形一样，民政厅接待官员要求他们在申请书上补充四项条件：一、必须要有人民币五万元注册资金；二、必须在申请书上列明“中国民主党办公场所”；三、必须列明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人员的个人简历；四、必须列明中国民主党五十名成员名单。由于中共当局一反传统对待反对派人士的方式，让外界既诧异又好奇：中共究竟是迫于形势真的想开放党禁？还是因应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女士的造访以及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而暂时摆出的姿态？



“中国的曼德拉”、中国民主党人——秦永敏（累计刑期 36 年）

海内外对此看法不一。民运先驱王炳章发表“让策略灵活得使魔鬼迷惑——浙江、山东民运组党的感念之二”，赞扬浙江、山东的组党运动使国内公开层面的

民运活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筹组公开反对党的高度。指出勇气与谋略的同等重要性，“只有勇，没用谋，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只会谋，缺少勇，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两种倾向都要避免。策略是桥和船，是抵达彼岸不可或缺的工具”。相当肯定这次浙江和山东民运在策略上的操作，认为给后继者提供了不少借鉴。（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

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发表声明，对中共试图解除党禁的进展表示欢迎。后援会呼吁海外民运团结一致，给予中国民主党最大的支持，以突破中共党禁。

台湾的民主进步党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民运人士组党，共建民主中国。民进党资深顾问洪哲胜博士告诉记者，“台湾的民进党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的组党活动，该党表示密切注意事态进展，并呼吁中共顺应时代潮流，借鉴国民党的经验，早日推进民主制度的实现，造福两岸人民”。

与以上乐观其成的观点略有不同，部分党内外人士也对中共能否开放党禁，是否为新一轮的“阳谋”表示担忧。《湘江评论》主办人、现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发表：“值得警惕的另一种可能”。文中指出“组党的‘成果’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女士访华的特殊背景下取得的；中共自毛泽东开始有利用‘阳谋’引蛇出洞的传统；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不排除中共转嫁危机于国内民主运动；台湾民主运动的经验表明，目前条件下执政党不会轻易开放‘党禁’”。

工运人士申请成立独立工会，然后陕西工运人士赵常青被判刑三年，湖南工运人士张善光被判刑10年……，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不能对中共的一时容忍太过乐观。

王炳章发表：“审慎乐观，谨防引蛇出洞”，湖北秦永敏亦表示，“民政厅接受申请，并不意味着中共就会同意民主党组党，所以对这件事仍不能过于乐观”。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现时看不出北京政府有信心在政治改革上作出大突破，认为北京仍无意政治改革”。台湾立法委员多持保留态度，民进党籍立委施明德（台南市）表示，“中共拟准异议人士组党，有可能是‘假性多党’的阶段，台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中，直到一九七零年末才有真正的反对党出现”。

血祸

作者 /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李杰 翻译：刘芳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拨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在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以及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大力推动下，卖血更是成为一种风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宣传语，而河南睢县电视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其中。



1996年，高耀洁教授在河南省会第一次会见到艾滋病病人，发现感染源来自于血库，随后开始对艾滋病疫情的调查，并自行出资进行防艾宣传活动。在深入调查后高耀洁得出令人震惊的结论，河南省内共有140万人参与“血浆经济”，以每个县平均2万人感染计算，至少有102万人感染艾滋病！



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一家四口，丈夫和妻子因为献血感染艾滋病毒，妻子于1997年夏天死于艾滋病，她是这个村里第一例年夏天死于艾滋病感染的病人。



艾滋孤儿高阔与养母（左）和高耀洁（右）在一起



2004年，她与衡阳消防兵、梁雨润、尾山宏、钟南山、达吾提·阿西木、杨利伟、巴金（舒以代）一同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



2001年，文楼村的村民告诉来访记者，他们希望提出诉讼，但不知道该把谁推上被告席



宁陵县因分娩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的产妇到北京上访，宁陵县200多名产妇输血感染艾滋病毒，上面不追究责任反而极力袒护，受害者上访就打压，两名上访者被判刑，近10人被刑拘。



河南省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高耀洁勇于曝光事实，而地方政府则希望掩盖因工作失误、失职以造成的艾滋病蔓延。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高的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母女关系受到严重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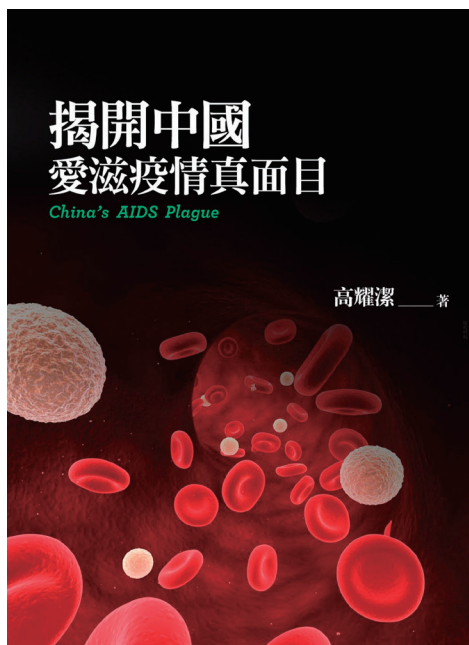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中国政府才准许她访问美国，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14日下午，希拉里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高耀洁。

2016年10月，高耀洁于纽约曼哈顿的公寓。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附近一所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深居简出，继续她的艾滋病事业，短短几年写下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高耀洁医生，于当地时间12月10日在纽约的家中逝世，享年95岁。她的葬礼18日在纽约上州的芬克里夫墓园举办。她因揭发90年代中国河南卖血和“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蔓延，而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

毛庆祥（发起人） 谢长发（倡导人） 胡石根 陈西
吕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鲁慧文

副总编辑：罗志飞

轮值总编辑：何愚

日本分社社长：漠北独侠/漠北孤侠

加拿大分社社长：韩瑞媛

副主编：张致君 陆乾坤

责任编辑：罗志飞（部长） 胡丽莉 李聪玲 刘芳

编辑部：李之洋（部长） 李聪玲（副部长） 钟然（副部长） 胡丽莉 张致君
韩焱 王梦梦 袁崛 周志刚 Gloria Wang 赵杰 李堃 韩立华 程伟 冯仍

美编部：胡海宁（部长） 刘敖（常务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翻译部：刘芳（部长） 吕峰（常务副部长） 何兴强 彭小梅 Tomorrow

信息技术部：卢新虎（部长） 李建伟（副部长） 易诚（副部长） 张湘潇 卢超 程筱筱 邢志远

校对部：冯仍（部长） 熊辩（副部长） 林小龙 程筱筱 李杰

宣传与发行部：Gloria Wang（部长） 彭硕（常务副部长） 曾群兰（副部长） 夏体姍 程筱筱 黄吉洲

采访部：巫伟杰（部长） 林小龙 赵杰 Cooper Guan 张致君 常坤 姜晓明 邢致远 潘荣华 安浦

外联部：张致君（部长） 赵杰（副部长） 陆乾坤 常坤 杨晓 权录军 Rong pt sss

收稿部：马群（部长） 彭小梅（副部长） 杨长兵 罗志飞

财务部：朱晓娜（部长） 高晗（副部长） 朱小砚

人权观察部：安浦（部长） 张维清 黄吉洲

行政部：吕聪（部长） 张宇（副部长） 鲁慧文 罗志飞

法务部：陈闯创 郑存柱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张致君)

募捐信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 1998 年的呐喊中诞生，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可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https://twitter.com/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Opposition Party INC

《在野党》9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姓名	捐款金额 (USD)	姓名	捐款金额 (USD)
ANG ZHU	\$100.00	陈信男	\$100.00
陈景辉	\$2000.00	何 愚	\$100.00
陈先生	\$5000.00	石皓伟	\$100.00
康 余	\$100.00	赵 欢	\$100.00
李建伟	\$300.00	曾群兰	\$100.00
鲜文君	\$150.00	曾群兰	\$89.64
黄吉洲	\$100.00		

萬潤南（1946-2025）：四通公司創始人，改革年代的先行者，八九民主運動的見證者。

他以工程師的理性與知識分子的良知，守望中國的自由與尊嚴。
他曾說：“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
他走了，但那年未竟的呼聲，仍在回蕩。
向萬潤南致敬。

